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2月28日第2期 总第180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80期

李宇锋纪念专辑

目录

【三老同悲】

郑仲兵 这个世上难得的完人

刘家驹 宇锋是我的忘年交

阎长贵 身残志坚李宇锋

【北大师友】

别宇锋——北京大学同学的悼词

钱理群 痛失李宇锋，我能说什么……

罗 新 老大不死

熊唤军 兄长宇锋

宋晓霞 宇锋的笑容

谢 宁 关于宇锋的点滴回忆

阮柳红 逆风前行忆宇锋

曾楚风 不思量，自难忘

女 真 天堂里的笑声

郑 梅 宇锋，我不想说再见

【文衡同仁】

冯敬兰 宇锋，说走就走了

丁 东 怀念宇锋

何 蜀 他是一个最苦最难的义工——痛悼宇锋

雷 颀 宇锋的意义

蒋 健 我心目中的宇锋

韩 钢 王海光 夜航传灯有斯人

刘 若 身坐轮椅，胸怀天南地北（诗一首）

戴为伟 何须向死而生——宇锋琐记

徐海亮 一点回想——我与宇锋

白 磊 宇锋兄，一路走好！

刘 进 宇锋，我对你说

吴 迪 不可复制的历史人物——宇锋二三事

【文衡资料】

李宇锋 给王年一的六封信（2005—2006）

李宇锋 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简况（2014）

一、简介

二、宗旨

三、业绩

1、采访近百位当事人、当事人亲属及有关学者

2、召集十五个主题计二十五场座谈会

3、积累资料

4、编辑书稿

5、《往事》

四、中心学术顾问

附：往事目录（1-117期）

【本刊声明】



李宇锋（1963年——2016年），民间刊物《往事》主编，当代国史研究者，民间学术活动的杰出组织家。198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就职于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远东国际贸易中心、北京中耐有限中心。2004年创办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任总经理。

【三老同悲】

这个世上难得的完人

郑仲兵



噩耗传来，我只觉得天塌地陷，肝胆俱裂。恸哭，眼泪怎么能冲淡我的悲伤和痛苦？！宇锋是这个世上难得的完人——少有的聪慧、正直、善良、勇毅、坚强、包容、幽默……他以严重残疾的身体，做了那么多健全人都难以做到的事；他以他生命的魅力，给同学、朋友、亲人带来那么多的理解、帮助、快乐和智慧。他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人！

在这十几年，为了理想和正义，宇锋每天都在超负荷地消耗自己有限的生命。他本不该这么早就离开我们。我不能不痛心谴责自己，我没有尽心爱护和珍惜他的身体啊！

我自认为在这个世上，宇锋是最了解我的人，我也应是最了解他的人，怎么能就这样让我们阴阳相隔了呢？

《往事》的真正主编是宇锋，它是宇锋生命的象征——“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春花秋月”讲的是寒来暑往的时日，不是指昔日的繁华。“往事知多少”是在自悔，自否，不是怀昔怀故。为探求往事，宇锋殚精竭虑，置生死于度外。《往事》成了他生命的纪录和思想的结晶，他最后留下的文字就是《往事》134期啊！为此，《往事》也成了我终身的伤痛啊！宇锋，你不该走，你却走了；我还活着，但活得很难受。你走了，我的魂像似散了。啊，我太难受了，我不知说了些什么，我还能说些什么？■

2016年除夕夜—2017年元旦

凌晨于香港

【三老同悲】

宇锋是我的忘年交

——前《炎黄春秋》副总编刘家驹口述

我和宇锋相识相知近 20 年，是对当代史的共识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很可惜，他才 53 岁的英年就离开了我们。



宇锋比我小 30 多岁，他在我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对当前政治社会有深邃的洞察力，不但和我是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而且还是我认知时务的老师。别看他身体残疾，每天守着电脑电视，却善知天下事。我这个“愤老”面对现实，大多是抱怨、指责。他比我理性多了，他能站在体制的高度看问题。

我是 1949 年的兵，参加过朝鲜战争，因为有高中文化和战场经历，被抽调参加撰写（第）12 军部队史。从红军长征到解放战争，从进军大西南到上甘岭战役，我颂扬了不少英模人物，记叙了战争中的胜利事件。后来调到李德生身边，宣传“郭兴福教学法”。1972 年到《解放军文艺》任散文组副组长，更大范围涉猎军史的对错是非，但负面史实不得见诸文字。从《解放军文艺》退下来以后，《炎黄春秋》聘我做副总编，干了十三年，在李慎之、李普、李锐、何方等老同志的启迪下，我走出了“伟大、光荣、正确”党文化的思维，用刘知己“不掩恶”、“不溢美”的历史观重新审视党史军史。

我曾代写一些老兵的回忆录，存留了大量的负面史料，我以此集结了七十多篇纪实性文字。宇锋看过初稿，认为它不再为军史贴金，敢于写出不准示人的真实事件，超越了“歌功颂德”，在表现方法上具有“颠覆性”。我诚心邀请他编辑我的三部书稿。他欣然受托。

不顾身残，一篇一篇仔细地提出问题，他考证出某些引文出处及“时、地”错乱等错误，随即动手进行改动，或让我作修改添补。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我的文章只研讨了一半就走了。

宇锋生前，我差不多每月都要去他那里一两次。他家像小课堂，除深入交谈稿件外，还聆听叙说国内外的大小事。我不会网上活动，他集纳的奇文异事，都会有选择的给我讲述，他有极强的思辨力，且见解精辟。

他是“红二代”的另类，对权势人物德行的品评，入骨三分，特别是对官僚败坏民主的独断专行，敢于直言不讳地谴责。

宇锋的性格好，待人接物真诚谦谨。人品更好，他不搞宗派，不结山头，不谈家长里短，善于团结政治上不同意见的人。

宇锋主持的《往事》中，“编者的话”锐利且有分量，让人振奋，很少人有他的胆识。

有一年，上面来人查抄《往事》编辑部，宇锋只身端坐在门口抗争，那股凛然正气让我铭刻于心。最终查抄者还是归还了《往事》的全部期刊。

我病重，他经常从电话里关注我的养生。我写下了给亲朋好友的诀别信，请宇锋修正。宇锋在信的末尾给我作了改动，他引用了刘禹锡的诗句：

古人云：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我相信历史，

我相信未来。

这是他坚信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的心声。我告慰天上的宇锋，您的遗愿一定会实现的。■

2017年1月12日

北京莲花池西里军干所

【三老同悲】

身残志坚李宇锋

阎长贵



我知道宇锋过世后，就给郑仲兵打电话，一直没打通。又从电子邮箱给他发了一封信，也没有回音。我估计，他大概是在北京。郑老师与宇锋感情很深，他知道宇锋病逝，一定非常难过。郑老师最近又发现了癌症，我真担心郑老师受不了这个打击。

宇锋走得突然，才53岁，和我家的老二同岁，都是1963年出生。他走了，真是没想到。宇锋生前采访过毛主席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也都很伤感。周护士还哭了。

我认识宇锋是在2004年。当时还有郑老师，是在北海后门那个文采阁。宇锋知道我给江青当过秘书，就跟我约定，让我讲文革时的事情，以江青为重点。我跟宇锋一直相处得很好。宇锋这个人确实不简单，他有那么严重的残疾，坐着轮椅，行动很不自由。他的腿都需要工作人员给他搬。可他干了那么多事。编《往事》，组织那么多座谈会，采访那么多老人，整理了那么多资料，帮助了好多人。这些事，就是放在一个健全的人身上，也未必能胜任。可是宇锋一个人全干了，十几年如一日。多不容易！

宇锋这个人的心确实很好，对人很善良，很有思想。你看他搞《往事》，他很有思想，很多看法都很独到、尖锐、深刻。《往事》搞了134期，很有历史价值的。它不是一方面，是（涵盖了中国现代史）各个方面。■



李宇锋

摄于 1998 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

别宇锋

——北京大学同学的悼词

李宇锋走了。53年的人生，固然短得令人痛心，但也长得足以让世人了解他、记住他。

我们记住了他的爱，对家人朋友的爱，对天下苍生的爱；也记住了他的恨，对黑暗邪恶的恨，对不公不义的恨。

他将以这样的形象被长久铭记：他是温顺贴心的孝子，他是情义深远的丈夫，他是宅心仁厚的兄长，他是忠诚恒久的朋友，他是满怀悲悯心的思想者，他是坚持行动的大无畏壮士。

他没能看到他所期待的光明之日，但正如他所深信不疑的，他做过的一切，他的爱、他的恨，我们对他的记忆和怀念，都必将有助于那一天的到来。

宇锋好走。天堂的温暖与你相伴。

2017年1月1日

【北大师友】

痛失李宇锋，我能说什么……

钱理群



真的，什么也说不出来……，往事历历在目……

宇锋是北大中文系81级学生，我在北大任教，教的第一个班，就是81级，给他们讲“现代文学史”，讲“我之鲁迅观”。我把自己整个生命投入，学生也敞开心扉与我交流，我因此常说：我与81级学生是生命之交。这样的生命之交，在我以后的教学中，也并不多见。再往后，当我感到整个北大离我越来越远时，就真的成了一个梦。就在这时候，宇锋出现了。

当年在校时我和宇锋接触并不多，交往多起来，是近十年的事。而一见面，我就感到，那样的几乎失落的生命之交，又回来了。我完全不敢相信，当年北大的那些让我和学生心心相印的东西——那样的理想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那样的历史担当，独立意识，都在宇锋身上完整保留了下来，这也是我这些年苦苦挣扎，竭力保存的：我们俩就在当今这个权力至上、实利主义的时代，再次相遇相通了，当然已经超越了师生关系，而成为真正的可以交心的相知了。最后一次畅谈，是2016年宇锋主持的邵燕祥先生创作七十周年的研讨会，记得讨论结束时，宇锋作了一个极动感情的发言，表示希望以后还会有这样的聚会。分别时，宇锋告诉我，他将去山东老家，并约好回北京后，再和几位年轻朋友一起到养老院来看我。谁料到，他这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留下我一个人——我突然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独！

什么都不说了，让这些回忆就埋在我的生命深处……■

2017年1月4日急就

【北大师友】

老大不死

罗新



那天下着很大的雪，我们从37楼走到办公楼，之后再走回37楼。在我们81级进北大后的第一个冬天，那不是第一场雪，也不是最大的一场雪，却是我记忆中最清晰的一场雪，似乎现在还听得见雪粒落在军大衣领子上的咝咝声，还记得灰喜鹊从未名湖边松林里倏然飘出钻进没有叶子的银杏枝桠间。我陪老大，就是李宇锋，到办公楼找某位领导递一封信。现在当然明白那是走关系，是老大的父亲本人或是他请动了什么人给北大方面打招呼，希望不要因为宇锋的身体情况为难他。按照那时的制度，新生入学后体检发现有重大问题的，会采取退学和休学两种办法，宇锋只好走后门混过这一关。从办公楼出来，寒风迎面，我冻得一哆嗦，说：“好冷呀。”我这个湖北人分不清冷和嫩，说成“好嫩呀”。宇锋哈哈大笑：“不嫩，一点都不嫩。”

那时他面临退学或休学的严峻局面，后门是否管用还不一定，但他全无忧戚之容，一路和我说说笑笑，仿佛是在做着踏雪寻梅的雅事一般。这也是他一生的境况，无法根治的重疾自少年时就纠缠着他，随时可能夺走他的生命，他却乐呵呵地走自己的路，竟圆满了一个不寻常的人生。借用书上的话来说：他勃发着生命、健康和意义，他是死亡的对立面。

三十六年来，我只在跟别人提到他时称呼他宇锋，对他说话时，我从来都只叫老大。入学时各宿舍序齿排行，基本上是那时校园里的一种传统风俗。大多数宿舍只是一时热乎，慢慢也无所谓了。幸运的是，我们宿舍的六人之间，真正建立起了兄弟之谊，这种关系成了我们终身的情感所系。能够如此，老大要居首功。我们这一代的男性，固然每人各有自

己独特的成长史，大致上少年时都曾沉浸在《三国》、《水浒》、《说岳》、《说唐》之类中国式的英雄主义世界，都向往过义结金兰同生共死的兄弟情义，所以大学宿舍的兄弟排行，多多少少是实现少年梦想的一个机会。宇锋正是理想的大哥，他宽厚善良，豁达大度，外圆内方，重情重义。他还有另外一些条件：他家在北京，而且是一个好客、温暖的家，他的父母姐妹都热诚欢迎我们；因为父亲是高级干部，他可以常从家里带东西来校，特别是一条一条的香烟，很多同学早早变成烟鬼，他实有启蒙培养之功。

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一部红色电影《大浪淘沙》，讲四个青年义结金兰，一起追求理想，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四人本不明显的差距一步步放大，友谊经不起形势的考验。结果一个走上颓废之路，一个投靠反革命成为坏人，一个成长为标准版革命者，而那个本来原则性不强、旧观念很重的老大，在标准版革命者的帮助下最终走上革命之路。抛开影片脸谱化、意识形态化的一面不说，我一直对这个故事的象征意义很感兴趣。一群本来差别不大的青年，比如我们这样的大学同学，经历岁月的冲刷，会成为各自差别极大的中年、老年吗？几十年过去了。这可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急骤的几十年，我们都经历了前人从未经历过的时代淘洗。再聚之时，除了说那四年的同窗旧事，当然要面对现实。的确，很多人都变了，或者说，彼此觉得对方变了。然而幸运的是，当年的好朋友，现在还是好朋友，没有谁变得让我不认识。1998年校庆聚会时，老六（熊唤军）有一句令人拍案叫绝的评论：“男的还是男的，女的还是女的。”大浪淘沙，但淘不了岩石。

我们宿舍六人，只有老五（谭军）上学时因在留学生楼陪住，与其他几人稍有距离，且很早投身团干系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倾向。那时向往入党从政的学生占相当比例，毕业时进入党政系统的人也不算少，当然至今还在其中的已屈指可数。老大和老五都进了这个轨道，到九十年代前期都退了出来，而且也都下海经商了。看起来是一样的轨迹，但熟悉他们两人的就知道其实大大不同。我毕业后到了武汉，与在京同学书信往来，谭军至少是联系最多的之一。他常常谈北大情况，介绍自己的工作，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满。我当然为他高兴，但也觉得他对现实的欢乐情绪与我从其他人（比如老大）那里听到

的，差距相当大。1987年年初的反自由化运动，谭军十分活跃，多次在电视报刊上表态。我替他着急，去信劝他，也告诉他我最近的思想发展——我刚刚完成了从懵懂青年向自由主义者的转变。没想到他回了一封简短的信，说“人各有志”。我读信后相当难过，晚上打电话到老大家，说起这事。老大平静地说：可不是嘛，人各有志。

那之后我和谭军就没有什么联系了。1989年秋我回北大读研，偶尔遇见，没有谈什么，不久他离开北大去办中心。一次在校园碰见他，说是作为企业家校友回来和校长座谈，还是那么意气洋洋。唯一不同的是他突然胖大了许多，整个人大了一圈，从前那副精干劲儿完全被新增出来的肉给覆盖了。下一次见面是在央珍家的同学聚会上，他来得晚，一进门就问电话在哪儿，而他手里正抓着大煤块一样的大哥大（后来胡伟跃多次提起这个场景）。那时老大也已下海，到海南挣钱去了，我甚至猜想，是不是下海的人都会走这个风格。夏天老大回北京，老彭（彭鸣宇）张罗了一次聚会，在北影对面的四川酒楼。老大也比从前胖了许多，这一点和谭军的变化相近。但其他方面，老大还是从前那个老大，笑呵呵地谈一切，一切让人高兴的，让人悲愤的，让人齿冷的。没有人知道我因此是多么的快乐。

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是我们班毕业后聚得最齐的一次，超过一半的同学都到了。少年同学，已成风历雨的中年，真是美好的聚首。在齐聚潮白河岸之前，先有几次预备性聚会，其中在北太平庄那一次，谭军令人意外地露了一面。没有人相信他竟变得那么肥大，面部增大了将近一倍，眼睛深陷在肉里。他说笑几句就走了，之后再没有同学见过他。听说他是因病吃药导致身体变形，但什么病我就打听不到了。十多年来，同学聚会常有人对谭军的全无踪影感到不解，我也利用一切机会探听他的下落，然而毫无结果。我怀疑他已不在人世了。上苍明鉴，我希望这个怀疑大错特错。不过，对我的情感世界而言，他是否在世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们是飘进历史激流的两片落叶，早就相忘于江湖了。幸运的是，同宿舍的其他几位，以及同班其他宿舍的好朋友们，我们之间的那种相互理解，没有被岁月冲淡，一直保持到现在，其中老大在我心中更是温暖与情义的象征。

老大在发胖以前就是一副弥勒佛的长相，还真有弥勒佛“大肚能容”的气度，极少生

气发火。我见他发火只有一次，就是当几个同学玩男生间的扒裤子游戏玩到他头上的时候。大学三年级时，不知从哪个宿舍开始流行起强制扒下某男生裤子的游戏，几个同学上去死死抱住一个，再来一两个人把他裤子扯下来，有时还拍打他的光屁股，噼噼啪啪的。风水轮流转，被扒过裤子的同学在扒别人时玩的更加起劲，几乎没有同学能够幸免，即使是梁寒和我这样自恃身有武功的人。当所有男生被扒了一个遍(不算那些从不参与嬉戏的同学)，个别人还被凌辱多次之后，几个勇士就盯上了唯一的幸存者老大。在他们嬉皮笑脸时，老大就正色警告。但没用，几个人还是一拥而上，搂的搂，抱的抱，解的解，扯的扯，很快就得手了。也许是慑于老大的愤怒，这几位点到为止，并没有真地扯下他的裤子。不过老大这下可真是大发雷霆，脸都气白了，双手直抖。和我一样，大概这是很多人唯一一次见到老大动怒。

宽厚的老大从不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从不在重大关节上说违心的话。当年已然，这二十年来他做共和国史研究更是如此。大概是 2000 年以后，有一天他打电话要我把秦老胡同 33 号院借给他临时用一下。秦老胡同 33 号院是美国唐研究基金会创建人罗杰伟的住宅，他不在北京时，委托我监管。秦老胡同也是老大的父母家所在，我们上大学时就很熟悉的，只不过那时叫交道口南五条。正是因此，好些年里我去 33 号时，常常顺道去看他。我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院子，他说采访聂元梓，要拍录像，需要一个好一点的环境。我这才知道他已投身一个艰难、危险又崇高的事业。我告诉 33 号院的守门人，李先生可以随时、任意使用这里。所以，后来他多次在 33 号院做那些采访。他主编的《往事》我基本每期都看，每次见面我都对他的事业表示敬意。他谦虚道，你那才是学问呢。我明白他心里还有另外的话没有说出来，就是，如果学院派的所谓学问与我们真实的生命无法连接，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从 2003 年夏天开始，ChinaRen 的网上校友录发展起来，大学同学（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学）得以在毕业近二十年之后突然亲密接触，聊得不亦乐乎。网络版校友录之后，微信接上，卷入的老同学更多。这些新媒体的出现，使老同学间的交流比当年更直接、更频繁，

甚至更深入。在最初的热络之后，同学各自的不同立即暴露。这十几年我们目睹的社会分裂也同样发生在老同学之间，大家对同一事件、同一问题的理解、看法和立场往往截然不同，同学中很快分出彼此对立的两派。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年是好朋友的，通常还会是一派的，只有个别例外，并不是因为旧有的情谊，而是想法的确大致一样。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我那几年曾经就一些问题与同学在网上争吵不休，短期内竟能写出数万言的论战帖子。当然，这种论战总是不会有胜利的一方，不管你逞了多少口舌之乐。而且每一次激烈争吵之后，总有受伤之感，至少会对自己的老同学冥顽不化（或内心斥之为堕落）感到绝望和伤心。老大都看在眼里，虽偶尔也说几句，却很少纠缠不休，更不会说出伤感情的话。有一次见面，我说这文八一可真是乌七八糟啊。他笑道，够好的啦，我别的同学群，那才是一边倒呢。他这么说，我才意识到我的大学群几乎没有出现过煽动战争、煽动仇日仇美的言论。而我的中学群里，说几句日本的好话就可能被唾沫淹死。也许这说明，北大同学，毕竟是北大同学。

老大开始共和国史、中共党史和文革史的资料收集与整理之后，进入了一个特别的圈子，常相往来的是一些我不大熟悉的人，虽然他跟我提过几次，我基本上没有跟着他加入这个圈子的活动。当然有几次例外。某一年的六月四日，我研究生时的同学、新华社某记者电话我，说在海淀某处有个聚会，让我参加。我因学校先有事，到得晚了，进去坐下，被一一介绍，记得有几个名字是听老大常提到的，比如居中坐在主座上的郑仲兵先生。介绍到最后，坐在我右手的那位忽然说：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居然是老大。这个聚会主要是老大他们那个圈子的人，他因坐轮椅，所以位置紧靠门口，我进门也正好坐他旁边，但一直没有转头看旁边有谁，他竟也忍着不叫我。此后我参加过他们的几次聚会，每次我都扮演司机的角色，因为我开的本田CR-V比较高一些，方便老大上下车。在这些聚会上认识了大名鼎鼎的张思之、邵燕祥等，也见到多年没见的钱理群老师。好多次老大让我去给他们那些人介绍介绍西北特别是新疆的民族问题，我出于谨慎，不知道话说到哪一步为好，没有同意。

说起来惭愧，我这十年见钱理群老师不过三次，三次都要感谢老大。听钱老师分析形势、评论时事，感觉像回到了1981年冬天的北大化学楼，还是那么慷慨急切，还是那么深沉宏大。老大去世后，在网上读到钱老师的话：“宇锋是北大中文系81级学生，我在北大任教，教的第一个班，就是81级，给他们讲‘现代文学史’，讲‘我之鲁迅观’。我把自己整个生命投入，学生也敞开心扉与我交流，我因此常说：我与81级学生是生命之交。这样的生命之交，在我以后的教学中，也并不多见。再往后，当我感到整个北大离我越来越远时，就真的成了一个梦。就在这时候，宇锋出现了。当年在校时我和宇锋接触并不多，交往多起来，是近十年的事。而一见面，我就感到，那样的几乎失落的生命之交，又回来了。我完全不敢相信，当年北大的那些让我和学生心心相印的东西——那样的理想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那样的历史担当，独立意识，都在宇锋身上完整保留了下来，这也是我这些年苦苦挣扎，竭力保存的：我们俩就在当今这个权力至上、实利主义的时代，再次相遇相通了，当然已经超越了师生关系，而成为真正的可以交心的相知了。”

在这一小段话里，深情的钱老师把他所珍视的八十年代精神概括为“理想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历史担当和独立意识”，并且说这些价值“都在宇锋身上完整保留了下来”。熟悉钱老师的人会非常理解他的立场和他的表达习惯。不过，我觉得仅仅“理想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历史担当和独立意识”，并不能担保当年的团支书李宇锋成就为今日的边缘人李宇锋。其实当前深刻分裂的社会和知识人，除开那些卖身投靠营求私利者不论，森严对峙的两造，都觉得自己才是“理想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历史担当和独立意识”。我们这一代人自幼接受的红色教育（革命英雄主义），与这种所谓八十年代精神的对接，并没有太大的困难，因为抽象的理想主义与忧国忧民，是任何意识形态都乐意高举的旗帜。我们这一代从幼稚的理想主义脱身而出，成为坚韧的独立思想者和行动者的，并不在少（老大当然会列名其间），他们之所以得此成就，恰恰是在现实一再打击下，看到了旗帜的虚妄与欺骗，转而探寻历史真实，用历史真实解放虚妄谎言包裹中的自己。正是在与现实的反复对话中，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比如老大，滋养出充沛丰满的心灵，已远远超越了八

十年代的激情与梦想。东方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西方圣人说：“真理必给你自由。”大彻大悟才能超越生死，老大足以当之。



老大的身体从来就不好，但我把他的身体与生死问题联系在一起，是到他 1987 年第一次动手术之后。后来他又做过几次大手术，最大的一次是 1999 年。那年夏天我在南疆沙漠中翻车受伤，送到乌鲁木齐住了几个月医院。大学同学中借出差机会来医院看我的，有老大和阮柳红。老大笑呵呵地说，等你好了，就可以来医院看我啦。那时他已定了秋天在天坛医院手术。十一月我回北京时，他刚刚做过手术，老彭约我看他，他还不能言动。后来出院，转往南四环外的一所康复医院，我去看过他，也陪从美国回来的郑梅去过。老大问我恢复得怎么样，现在疼不疼。我答道，古有人说“不堪秋气入金疮”，何况这么冷的冬天，最难受的疼痛就是酸痛。老大表示理解，后来他几次提到我说的这种酸痛，其实我早就忘记那种滋味了，老大自己却一直与它为伴。

我的身体很快康复，又可以跑野外了，几年后老大却上了轮椅，再也没能下来。这些

年眼看他不仅不能好转，甚且越来越糟，但从没想过他会突然辞世。2013年秋天有一次我送他回亚运村，路上问他的身体，他才说，前一阵因心脏问题住过医院。后来我才知道那一次几乎未能抢救过来。他说，医生警告他，他随时可能发生心脏衰竭。我听了暗暗心惊，跟老彭交流了一下，知道他是真的随时都有危险。我和老二（章立锋）商量，大家聚聚，把老六也请来，免得出个意外就终身遗憾。后来老二张罗在海淀锡华酒店聚了一次，老六也专程从武汉来了。我开车接送老大，他问，老六怎么这么闲，专门来北京聚会。我说，他是怕以后见不着你了。老大哈哈直乐。

后来又见了好几次，看起来精神不错。最后一次见，也是老二组织的聚会，2016年6月，在海淀公园旁边的一家啤酒屋。那一次我正在病中，好像没说什么话。6月中旬以后我连续出差，未能参加后面的几次聚会，而老大不久去东营一家康复医院，我们再未相见。直到2017年1月2日早晨，我在东营见到沉睡中的他。在楼上举行告别仪式之前，我到楼下先看了一下，确实如老大的姐姐所说，他脸上竟是那种我们很熟悉的笑容，有点莫测高深，有点嘲讽的狡黠，有点与人为善的将就，也有他坦诚的由衷之乐。告别仪式后，我走到外面阳台上，老三（郑富权）、老六也在，我们就那么傻站着。看着漫天的大雾，大雾中隐隐闪现这么多年里的许多温暖、许多笑乐，仿佛听得到身体里面撕裂的声音，感觉到内心最深最深的地方冰冷无比。■

【北大师友】

兄长宇锋

熊唤军

那年入学后不久，如那个年代校园里所习见的，宿舍6人序齿排“座次”，宇锋位居老大，我为老六。从此，同室诸公互相以老大……老六相称，至今三十多年不变。



江湖人士以序齿结为异姓兄弟。那时候我们按年龄排序次，谁也没有存有就此结拜兄弟的想法，想不到几十年过来，除了老五多年失去联系，我们余下五人不仅有难忘的同室同窗之谊，还有一份兄弟之情。

回首这三十年来和宇锋相处交往的漫长时光，他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位兄长，一位性情宽厚仁义的老大哥。

大学四年，除去周末假期以外，几乎朝夕相处。毕业后我回到湖北至今，有十数次在京与同学们欢聚，只有一两次值宇锋不在北京。真要好好想想和宇锋交往的种种，得到的却多是一些不连贯的碎片，不少事儿只记得有其事，场景、细节、话语、氛围一概阙如，面对自己的善忘，惭愧之余，只有苦笑。

而如今，我也只有凭借破烂的记忆之网里残留下的那些时光的影子来怀想兄长宇锋。

记忆碎片里，有校园4年里一起去教室、图书馆、饭厅，一路上他那拖着沉重的脚步。有他在宿舍床上盘腿打坐看书的情景，有他因身体不好不能随班上体育课在操场练习太极拳的身影，有学期末他带我到秦老胡同他家中复习的印象，有打升级时他一手好牌在握顾盼自雄的神情，有课间休息我们吞云吐雾时的场景。更有他逢人开口笑，伴随着爽朗笑声，荡漾在脸上的快乐神态……还有大三在江苏泰县采风实习时我们分在一个组，他给女生解释“猪发情”是指“猪产生爱情”的急智，我们一行近十人在泰县城关集体乘坐人力车呼啸街头的疯闹。更忘不了他张罗给我们几位同学过生日，回荡在圆明园林间的欢声笑语。

毕业后每次在京相聚，同学中常联系的诸位藉由无边无际的胡扯乱抡来重温我们的友谊，我们对这种言不及义的胡侃乐此不疲，酒酣耳热、言笑喧腾之际，恍然回到了校园时光。在我潜意识中，这是隔几年就会来一次的不散的筵席。

宇锋的病根是很早就埋下的，九十年代后，做过几次大手术，每次手术都风险极大，最近几年更因心脏病数次生命垂危。记得02或是03年我出差承德返途中，同学在北京小聚，他已行动不便，需要人搀扶或靠墙撑持才能缓缓挪步，那时我还以为他是因体胖锻炼

不够才艰于行动，只要多运动运动就会有改观。没想到，几年后再见面时他已被轮椅绑架了。

毕业后在京与同学相聚，大都借助出差的机会，只有近4年里的两次聚会，是专程到北京会同学。前年深秋与宇锋和同学们的一次聚会，行前我犹犹豫豫，差点没能成行，而这竟成了宇锋生前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宇锋去世后，罗新受托代表宇锋大学中学同学写了一篇简短精当的祭文，概述了宇锋留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印象。循着这篇祭文的余绪，我尝试将记忆的碎片拼贴成一幅宇锋的“画像”，他心性中有些特质是显见的。

宇锋有种迷人的快乐的天性。他去世后，同学们不约而同回忆起他那爽朗的笑声，笑眯眯、乐呵呵的神情，他是一个快乐的大男孩。尽管长年病痛缠身，世事不如意处所在多多，我不记得他有过阴沉凛冽的神情。



他善良仁义、宽厚谦抑的品性，对友谊的珍视，如磁场一样吸引我们，在我们班，他

有很多真心朋友。我也知道，在中学同学中，他也有众多一直保持真挚情谊的朋友。

我对宇锋性格上的认知是在大学四年里形成的，总的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温和”的人。近10年来借助校友录和微信交流，我对毕业后他的情况多了点了解，也对他性格中坚韧坚硬的一面有了发现。

距宇锋猝然离世不觉已有一个多月时间了，元月2号在东营送别时那漫天的大雾还不时飘过心头。 ■

【北大师友】

字锋的笑容

宋晓霞¹



我和宇锋相遇很早，真正相识却很晚。我们十七八岁的时候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文学专业的同班同学。不记得在燕园的四年间，跟宇锋有过什么交集或者故事。毕业的时候，宇锋去了北京市委工作，我留在北大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生。毕业后我们有过许多次聚会，记得去过秦老胡同的宇锋家里，也在钓鱼台宇锋的办公室聚过。印象最深的还是1998年北大校庆100周年的那次聚会，我翻出当年的照片，看见宇锋像个孩子似的从心里笑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宇锋的笑容有着怎样的份量。

那是相隔很多年的一次聚会，我和同学们惊见宇锋坐在轮椅上。然而，他的样子却很

¹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研究。

笃定，安详，尽管他连把自己的一条腿从另一条腿上拿下来这样的动作，也需要护工的帮助才能完成。令我震撼的是，宇锋的脸上仍是那熟悉的笑容，好像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听罗新说起过，多年来宇锋“以病残之身拼命工作，在当代史研究和资料整理方面贡献甚大”。惭愧的是，宇锋在世时我并没有系统地读过他创办与主编的《往事》，只零星地在相关的史料中遇见他的名字与文字。当我跟他提起所见的片鳞只爪时，宇锋就像平常那样冲我一乐，多一个自誉的字都没有，好像他就是一个平凡的人。

大约是2013年的时候，同学来电说宇锋再次经历了病危之后，很想和同学们聚聚。记得这次聚会是章立锋做东，彭鸣宇或罗新开车接来宇锋，当年跟宇锋同屋的熊唤军专程从武汉赶到北京。聚会照例是大家在一起“瞎扯蛋，开玩笑”，所有人都卸了30年的世故直奔十七八岁一起可着劲儿地撒欢。宇锋在同学们中开怀大笑，在他的脸上找不到一丝儿死亡的阴影，也没有任何委曲和焦虑的痕迹。宇锋比我们更懂得生命的脆弱，也比我们更知道生命的宝贵。我们大学毕业30周年那年，他为组织聚会曾奋不顾身亲赴在昌平的北大200号考察——当年的某个春天我们集体住在200号植树劳动过。回想起来，宇锋是在争取时间尽可能多和同学们相聚在一起。和当年上学的时候一样，他总会把自己珍爱的和亲近的事物与大家一起分享。比如我有一本宇锋惠赠的蒋彝《儿时琐忆——一个中国人的童年》（宋景超、宋卉之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代前言《一个中国人的生平》为蒋先生次女蒋健兰撰写，她是宇锋的中学老师，彼此友谊甚笃。有一回我们聚会，宇锋刚从东营回来，给大家带来自家院里种的菜——新鲜的、原生态的、带着泥土气息的食材，超市里按标准统一采购的蔬菜为之逊色。这又让我联想到宇锋多年的工作，他不仅为学界更为中国的未来贮存了大量被排斥、被隐蔽、被遗忘的（历）史料（料）。

宇锋的最后两年，常和我们在微信上闲扯。他为人幽默、豁达、坦然、宽厚，语带机锋却满怀善意与深情。我想很多同学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宇锋是可以与尔同销万古愁的人。记得有次我目睹北大燕园风物被毁，不禁痛陈“糟蹋东西呀”，宇锋却平静地回应：“才糟蹋这点就沉不住气了？”他的话既狡黠，又诚恳，让人无端地想到“思无邪”。这样的

交谈既有忧伤又有喜悦。忧伤的是无以回避地知晓了我们一直以来的真实处境。喜悦的是当我能够放下自己的处境，视野越来越广，人亦越来越自在，这种喜悦可以新生出强大的力量、信心和使命。

很难用文字写出这种奇妙的感觉，即使隔空在微信上也能感受到宇锋强韧的内力与人性的能量。大家因时事或琐事滋生的焦虑和压抑，就像从生活中结晶而成的盐，被他海洋一样溶溶澹澹的心性融解。于是我几乎有意或无意地“忘”了，宇锋随时可能被病痛夺去生命，也很少想到宇锋是用近乎失控的手在微信上写下了这些信息。他从未诉说过自己的状况，在他离世前一个月的时候，熊唤军曾开玩笑地建议宇锋打麻将练习用手，他平淡地回道：“手不利落都得推倒了”。张颖逗他：“不如送个田螺姑娘。”宇锋俏皮答曰：“俩呢。三儿（张颖的昵称）”，还附了张图片：两位护士一左一右正帮助他做康复练习。罗新见状忙鼓励说：“看着挺好呀！”他幽默地回应：“这待遇，再不好好康复简直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相较于常人对于死亡的畏惧，宇锋从容淡定甚至信心满怀地凝视着死亡的脸。2016年12月31日，当宇锋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许多同学都不肯相信，因为大家在前几天甚至前一天还在微信上跟他聊过天。对于死亡，我们通常是否定的，临终便是一切的结束，所以避之惟恐不及。宇锋的生命可谓是向死而生，他长期生活在死亡的压力之下，或许早已将死亡看作是生命的事。从这个事实出发，宇锋对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了然于胸，他用自己的工作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恒久的价值，让现实的生活拥有了终极的意义。宇锋接受了他的痛苦，他没有被严酷的现实及身心的痛苦打倒，而是将痛苦转化为一个精神净化的自然过程。

当宇锋在世时，他有深情有妙赏地爱亲人爱朋友爱同学，而他的离世让人领悟了那些在宇锋活着时隐藏着的非凡特质。宇锋留在大家记忆深处的笑容，展示了他的来去自如。蒙田说过，“学会怎么死亡的人，就学会怎么不做奴隶。”

宇锋在当代史所做的大量工作，堪称惊心动魄，它让我们以新的眼光看历史。历史不

仅是史实——过去的事，更是对史实有意识、有筛选的书写和再造，连我所从事的艺术史亦是如此。在宇锋生前，我们从未讨论过他所做的工作，也未交换过关于历史学的技艺与观念、理论与方法。在他离世后我又重读宇锋的文字，希望能感他之所感。透过宇锋的视角，可以看到“宏大的国家记忆”的影响，还有海量的“带有个体生命体温的私人记录”，尽管那些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也有可能成为客观准确还原历史的一种误导或障碍。透过宇锋的价值取向，最终我看到了人性。当初我们读文学的好处是可以游于艺，而且见情见性；而做历史的好处却是可以懂得人性。

宇锋走了，但他所做的工作在昨天、今天而且在明天仍然富有生命力，将使那些被排斥、被隐蔽、被遗忘的历史叙述浮出台面，犹如从死亡中重生。如今，我们还活在这里，我试着去揣摩宇锋，揣摩他的痛苦，他的坚强，他的爱，以及他的孤独。宇锋走了，但是我感觉自己刚刚开始与他相识。

宇锋的笑容，呈现了一种看待身边世界的新方式。

2017年2月14日

【北大师友】

关于宇锋的点滴回忆

谢 宁

宇锋是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他的离世非常突然，头几天我们还在微信群中讨论过有关问题，不料几天后就得到了他的死讯。他的去世也不完全出乎意外，两年多前我就听钱理群老师说他曾经被抢救过，他面临的生死时刻可能已经有过多次了，只是我不太了解，不愿意面对。上大学期间我也知道他患有某种疾病，后来可能是病况发

展了，多年前就看到他坐了轮椅，但具体情况我并不清楚。看了曾楚风的说法，才知道医



生曾说过他能活过三十都是奇迹，然而他却顽强地多活了二十多年。

我和宇锋应该是很熟悉的，我们还曾经合住过一套宿舍，只是我在外间，他在里间，毕业后我们也时常见面。但是我和宇锋的关系正如对他的疾病一样，虽然知道却并无深入的了解。说起来我和班里的许多同学一样，都受过宇锋的不少恩惠。宇锋的父亲是石油界的元老，

曾经长期担任胜利油田的一把手，同我们班上多数来自普通家庭的同学相比，宇锋算是出身高干家庭了。他们家在秦老胡同有一套房子，我们大学期间就多次去过他家里，当年的大学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去宇锋家可以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还可以看到平时难得一见的彩电。记得有一次我们吃饱喝足了看电视连续剧《武松》入了迷，赶不上末班车了，几个人只好花了好几个小时走回北大。宇锋平时从家里带来点吃的、抽的，也被大家毫不客气地立刻瓜分了，甚至不留一点给他，但他却从无不悦。毕业前夕我的经济状况一度比较紧张，还曾向宇锋借过钱，虽然数目不算大，但对当时的我可谓是雪中送炭。我想宇锋如此帮助过的同学绝不会只有我。

大学毕业后宇锋去了北京市委研究室，我则留校在党委办公室做秘书，我们工作性质比较相近，加上平时比较投缘，所以多次见面。同上学期间一样，秦老胡同他家仍然是我们同学不时聚会的地方，但是我好像没有单独去过，也没有和他有过单独的相处。对他的工作和身体状况我也所知甚少，只是知道他先是离开了北京市委，曾经下海经商，后来身体也不能正常行动了。

我对宇锋多年来可以说是很熟悉，但并无真正的了解。对他了解稍多还是在他做了口述历史之后。宇锋多次把《往事》发到搜狐的同学录里，我大部分都收藏了，也看过其中的不少篇。应该说宇锋做的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往事》的内容涉及到中共历史的各

个阶段，涉及到很多人、很多领域，还有一些内容是披露苏联东欧时期状况的，让我们了解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我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受到震撼的感觉。

《往事》的内容大都是无法公开出版的。在未被彻底整肃之前的《炎黄春秋》上，我也曾看到过宇锋整理的访谈，例如对林彪、江青身边秘书、警卫的访谈，而发表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和宇锋访谈时相隔了10年左右。就在宇锋去世后不久，我阅读沈志华先生去年出版的演讲录，其中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一篇演讲中，后面附录的几个主要的提问就是由宇锋提的。这些内容在《往事》上并没有见过，我只是偶然地看到了这些文字，但可以管中窥豹，足见宇锋参与这类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2014年年中我完成了记录北大近三十多年来历史的一部书稿，后来网传的书名被称作《北大三十年》。我知道宇锋是做这方面事情的，就将书稿发给他请他审阅并寻求正式出版的途径。宇锋看过前言后马上发了短信给我，内容是：“谢公牛逼！真牛逼！太他妈牛逼！就是捧Xi一段太他妈恶心！”书稿完成前夕最高领导人来了北大，我当时对他还是看不清楚的，另外出于自身保护的考虑，不无违心地写了一段话，和全书的风格确实有些别扭。当然更主要的目的还是我当时抱有一定的幻想，期望其能够采取毛发动文革借助北大作用的策略一样，以北大作为突破口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后来的事实说明我完全是自作多情了，而宇锋的认识则一直是非常清醒的。此后虽经宇锋等人多方努力，但我的书稿的确无法出版。不过让我感到荣幸的是，宇锋在和我沟通后，将书稿经过编辑、加编者按后分几期发在了《往事》上。

我和宇锋有过类似的体制内的工作经历，但我不能不承认，宇锋的经历、阅历要比我丰富得多，觉悟的比我早得多，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比我深刻得多。当然我也有一些和他看法不尽一致的地方，例如对于现状如何改变，我倾向于依靠众人的力量形成压力，促使当局者做出改变，即使不能促其改变，也至少可以使其难以倒退。他去世前几天我们最后一次在微信群中交流，当时是雷洋案刚公布涉案警员不起诉，造成民意的又一次沸腾。宇锋意思是说大家再嚷嚷也没有用，他此前也说过类似的话，我确实不完全赞同。我承认宇

锋说的是对的，但还是认为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他突然去世之后，我忽然意识到宇锋也许是看到的黑暗面太多，加上他的身体状况早已是朝不保夕了，或许会有些消极情绪，有些绝望。当然这只是我的揣测，宇锋到底是怎么想的（2016年6月4日，海淀公园附近的普兰达啤酒屋）我是无法知道了。不过退一步说，对宇锋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人，即使他有些消极情绪也是完全正常的，何况他做的那些事情，他对于历史真相的记录整理，实际上已经为改变现状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在而且必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宇锋走了，我最感到遗憾的是我和宇锋之间没有过更多、更深入的交流，特别是对他



的身体状态，对他的心态不甚了了，对他所做的工作也只是一知半解。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钱理群、郑仲兵、雷颐、丁东、吴迪等思想学术

界的重量级人物都写了关于宇锋的回忆文字，可以通过他们的笔触了解到宇锋更多的事迹和价值。我们的同学中如罗新、彭鸣宇、胡伟跃、曾楚风等，他们对宇锋的了解，对宇锋的关心都远远超过我，不管是在他们的笔下还是心目中，都会有一个形象更加丰满、可爱的宇锋。

宇锋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离去的，但是彻底的黑暗毕竟已经过去，我们已经多少见到了一些曙光。张鸣先生在高华先生灵前说过的一句话曾令人动容，我想将这句话献给宇锋也是最合适不过的，我也要向宇锋的在天之灵大声高喊——

宇锋兄，天总会亮的！ ■

【北大师友】

逆风前行忆宇锋

阮柳红



胸部发紧，像是被勒住似的，使劲想喘口气还能听见喉咙底下呼噜呼噜的鸣音，医生放下听诊器，认真地宣布我有哮喘及肺部感染两个病灶，必须马上做心电图和CT检查，并指着一旁的轮椅让我坐着去。望着为不能自行行走的病人设置的装备，我本能地予以拒绝。医生又警告说如果不坐轮椅自行在各层检查室之间上上下下，病症可能加剧，陪同的妈妈和弟弟急忙不由分说地把我安置到了轮椅里。

平生第一次蜷缩在轮椅里被推着走，在没有暖气的南方医院楼道里，冷空气嗖嗖地掠过脑门，着实比自己行走更冷，更不自在，感觉不太密闭的楼道好像骤然迎面起风，风速取决于推动轮椅的力量、楼道人流量以及楼与楼拐弯结合部是否顺溜，总之，一场风说来就来，且不在轮椅中人的掌控里。就这样逆风前行、楼道两侧的各种标记匆匆向后甩去之际，脑子里却突然闪现出一个坐了十几年轮椅、一个多月前刚离世的人，我的大学同学李宇锋。

如果现在李宇锋能看到我这一瞬间的轮椅体验，他一定一笑置之。的确，他十几年的轮椅生涯远不是我这几分钟所能揣摩的，我只是由此引发了对他近年生活的想象和理解，尽管我对他的了解少之又少。

李宇锋坐轮椅是近十几年的事，是因之前的病根导致的，但三十多年前上北大时，他还是个健康的青年才俊。我那时懵懂，和班上的男生几乎没什么接触，宇锋也不例外。只

由于他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公共活动出场率较高，对他的印象也就自然比对别的男生深些。

记得大二上学期刚开学两天，班里的一位女同学为情所困选择了死亡，地点就在31楼女生宿舍，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住在紧邻宿舍的我第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见到闻讯很快赶来的李宇锋我也只是不断地摇头。大约是扭头看到我一脸的茫然无措和痛惜，刚从出事宿舍见过逝者掩门退出来的他马上对站在他背后的我说：“看把阮柳红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语调带有他惯常的笑意。此刻，初秋的午后楼道明晃晃的，一米开外的二楼窗户边是绿茵茵的银杏叶，秋日静好，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然而死亡却离我们如此遥远又如此之近。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刻他的心情一定不比我好过，他是想舒缓一下惊慌悲痛的氛围，也许这一刻他也已然了悟，也许已没有也许了-----对他的话我当时的反应依然是无语，依然是摇头，然后就从楼道回到自己的宿舍去平复心情了。三十多年过去了，大学生活的许多事和人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但这件事和宇锋的镇静反应却清晰如昨。

弟弟推着轮椅送我到心电图室门口，我起身进门时耳后传来妈妈对弟弟的低语：“看来你姐已经不习惯这里了”。是啊，在有暖气的北方生活了二十多年，乍一回到室内温度甚至低于室外的冬日南方，劳累忙碌之下就水土不服上气不接下气了，这与当初大学毕业时因为不适应北方气候才回到南方工作正好相反。

我毕业后在福建省电视台文艺部当编导，虽然身体已经离开生活得并不习惯和舒适的北京，但精神却仍然沉浸于给我四年心灵哺育的燕园，一有出差北京的机会就绝不放过。出差北京的工作间隙，回北大，见女同学那都是必须的，男同学里，和宇锋联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和他联系上就等于和大部分在京工作的同学联系上了，因为凡是外地同学来京，他都尽可能召集大家一起聚聚，聚会地点自然是他在秦老胡同的家。印象中他家是介于北京标准四合院和大杂院之间的房子，有三四间面积不算小的房子，来的同学多了就都分散在紧挨着的房间里，有聊天有打扑克有抽烟，宇锋还是带着他那标志性的笑意几个房间来回串，一屋子热气蒸腾，很像是回到大学时为迎新年而在男生宿舍举办联欢活动的情形。

有一次出差是冬天，在宇锋家聚会吃午饭，大伙聊聊吃吃一下午就要过去了。带着他家的热气我大约四点多离开，等电车的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雪花飞舞，斜阳返照，远处的鼓楼极其醒目，那一刻的曼妙光景和宇锋家的温暖重叠在一起，永远留在了我心里，滋养着我在福建工作的日日月月。

转瞬就到了1998年，这时我已调到北京工作了近四年。在北京工作了反而与宇锋和同学们见得少了，总觉得都在北京见面有的是机会。春暖花开，趁着北大百年校庆的节点，我们中文系文学专业81级也张罗着全班聚会，我很快就接到了宇锋的电话通知，显然，他是活动的主要组织者。5月3日大家见面，蓝白竖条衬衫配吊带西装裤，宇锋的着装非常抢眼也非常倜傥，比他的着装更抢眼的是他的神情，两天的活动里他高频率地呈现着咧嘴笑的状态，有照片为证。就在去年北大校庆前后，我偶然翻出一张那时不知是哪位同学抓拍到的他和我相对大笑的照片，太开心了，我忍不住把照片分享到文八一群里，宇锋看到后却满怀歉意地提起我那时在顺义聚会处遗失一枚钻戒的事，他认为聚会地点是他找的，我丢钻戒他该负有责任。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都过去十几年了，他还记着这件事，连我自己都已经忘了，虽然当时感觉颇为疼惜。宇锋的歉意让我见到了他的善意，嘻嘻哈哈粗放的外表下埋藏着一颗真诚体恤他人的心。

心电图检查做完了，没有什么异常，弟弟推着我继续下一个检查。他是第一回推轮椅，不知道推着载人的轮椅进电梯时应该将前两轮稍微翘起才能顺溜地进入电梯，他是在电梯门经过两个来回的开合后才把我推了进去。幸亏现在大部分场所都能让坐、推轮椅的人来去自如，不过我第一次见到的坐在轮椅上的宇锋却是被两三个人一起抬着上来的。

那是2006年的初秋，张宇红在她的书吧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这几乎是百年校庆聚会之后参加者最多的一次。许多同学虽是几年不见，音容样貌并无多大变化，但当看到彭鸣宇等人沿着台阶抬着坐在轮椅里的宇锋上到二楼聚会厅时，我真是惊得不知说啥好，上前和宇锋打过招呼，也不敢直接询问他的病状。宇锋很沉静，他一定也知道同学们心里有无数个问号，他没做任何解释，脸上也看不出失落和病态。大家是沿着条形长桌相向而坐，

我坐的位置离他较远，看不到他的状态，只觉得他的话似乎变少了，有一两次我起身上卫生间路过他身旁，只看到他在认真听其他同学讲话，如果不注意他身下的轮椅，视线只落在上半身近景，你会感觉他和其他来聚会的同学无异，于是我把心放回了肚子，但还是忍不住背着他向了解宇锋病情的彭鸣宇打听他的状况，知道轮椅将是他未来生活永远离不开的工具。再后来的几次同学相聚，都能看到宇锋和他的轮椅，只因他乐呵呵、谈笑风生的样子好像全然忘记了轮椅的存在，我们也被感染得对轮椅视而不见。



2015年1月8日，又一次小范围同学聚会，这是我见过的轮椅上的宇锋最快乐、最享受的时刻，只见他左顾右盼不断说话并不停插话，说到高兴处便仰面大笑，手里还夹着一支点燃的烟，并没有吸几口，脸上却是一副赛神仙的陶醉样，我知道此刻他正在享受着和大伙相聚的幸福感，我就坐在他对面，不禁拿起手机纪录下这一瞬间。

轮椅拐来拐去停在了CT检查室，我第一次这样躺在CT室的检查床上，按照医生要求双臂向后展开，等待放射检查。闭上眼睛，忐忑地听着身下的自动床移动进入检查仪的扫描范围，我心想以宇锋的病状怕是要多次接受这样类似的放射性排查吧。我们相聚时他以快乐的一面示人，这出于他乐呵的天性，更因于他坚强的意志自控，试想在我们不见面的

时刻，他是怎样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和心灵的煎熬，有好几回在微信同学群里看到他下半夜还睡不着或者没睡多久就早早醒来，长期处于这样不能入眠的难受状态是我们正常作息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正因如此我更愈发钦佩他呈现出来的蓬勃的精神境界，他的风趣，他的智慧，还有他的大度。

和宇锋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5年的9月11日。为了便于轮椅移动，他坐在长条桌的一端，我则刚好挨着他坐。许是座位靠边儿和其他人不方便讲话，那天他只是静静地面带微笑地看着大家，我以为这样温馨的场景过不多久还会重来，也就只是静静地时不时和他相视而笑，没有过多的话语。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都不知道那是和宇锋的最后一次会面，惭愧的是我虽近些年从事过有关当代历史人物的纪录片创作，却对他多年来一直在做的口述历史工作没有丁点儿的了解，他从不主动提起他的工作，我也没有合适的时机向他讨教。那天的时间是从容的，但那天的氛围似乎不适于谈论工作，我就这样永远失去了和宇锋探讨交流的机会。

2016年的最后一天，包括北京及宇锋居住地山东东营在内的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被雾霾深锁了两天。屋内的净化器在持续运转，一早起来我就觉得胸闷气短。胡伟跃照例在微信群里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发红包，我和群里的伙伴们都在当仁不让地抢，我还纳闷平时眼疾手快的宇锋同学哪儿去了，怎么不见抢红包啊？！下午四点多，微信群就传来了宇锋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去世的消息。

我到现在还不能相信他真地已经走了，打开微信朋友圈，他的喜怒哀乐还在，他的留言尚存余温，我只能认为他超脱了他的肉身，他不再需要为病残的躯体痛苦，他也不再需要那拘束他的轮椅，他更不再需要逆风前行，他的灵魂将永存并自由翱翔于天地间。

写到这里，从键盘移开还残留着输液针眼的双手，我感觉自己十天前发作的两个病灶已被彻底修复！ ■

2017年2月17日于北京

【北大师友】

不思量，自难忘

曾楚风



我不记得对宇锋的第一印象，最早打交道大概都是班级活动，私下来往多了，是他把我带到蒋老师家以后。

为什么要去蒋老师家呢？估计和他牵头搞的那个“戏曲爱好者协会”有关。北大那么多的协会，我为什么进这个会？我自己家里没有一个搞戏曲这行的，但认真扒一扒，我和戏曲还是有关系。我最喜欢的王庚年伯伯的第二任妻子是个桂剧演员，她很漂亮，顾盼生姿，从不在乎有人说她是小市民。

在我当时的生活圈子里很特别。其次，我读过很多有关戏曲的书。我家的书架上——即使在最困难的年代里，小小的房间里还是有一架书，我找到两本1956年全国戏曲汇演的剧本集，收录有《打金枝》呀《罗汉钱》呀《拾玉镯》之类的剧本。读起来很有趣。我还看到一本王朝闻的《一以当十》，看着看着，就看到了剧评。王先生的剧评真好看，像讲故事，所以我知道了许多戏曲故事和许多名戏曲演员的故事。我甚至还看到了一本昆曲唱本，是有简谱的，于是看到了这一段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似这般，都付与了断井残垣……正当爱好春花秋月的年纪，见到这么温柔哀婉的语言，怎能不动心，从此我不抄《红楼梦》里的诗了，我改抄唱词了。

我爸爸1979年“平反”（他在1964年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这时终于有资格回到他们单位——当时的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当管理员。我常常沿着七星岩后岩走数里小路去三里店的师院新址看书。在那个弥漫着灰尘而且空无一人的资料室里看到了许多文革前的《戏剧报》合订本，上面有很多漂亮的剧照，我爸要是知道我整天在里面

看《大众电影》和《戏剧报》肯定要暴跳如雷。有这样的因缘，我想宇锋要搞这么个会，我是乐意参加的。参加这个会，必然要见到蒋老师。蒋老师愿意见我，我也愿意见蒋老师。

蒋老师是谁？她是地安门中学的老师，也就是宇锋的老师，在电脑上搜索之后，我才知道蒋老师是1981年退休的，也就是说宇锋应该是蒋老师带的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了。蒋老师的爱人刘乃崇伯伯曾经是《戏剧报》的编委，也退休了。他们老两口都是搞戏的。在戏曲圈有爱戏如命的好口碑。他们爱戏曲，当然就爱人才，在他们的影响下，宇锋和他的几位中学同学也算是戏曲爱好者，经常到蒋家参加各种活动。这几个学生的爱好也不一定有那么深，深刻的是师生之间的感情。我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师生情谊，这种情谊并不是随处可见的吧，是宇锋遇到了蒋老师和刘伯伯，而我遇到了宇锋，我才会见到吧。

2005年最后一天傍晚，我正在中南民院幼儿园接儿子，接到宇锋的电话，蒋老师走了。我很茫然地对我儿子说，我得去北京，蒋老师走了。儿子问，蒋老师是谁？我说，是老师。我想你不会遇到这样的老师。没想到，2016年的最后一天，我接到熊唤军的电话说，宇锋没了。我又茫然地对儿子说，我得去山东，书记没了。儿子问，书记是谁？我说，好朋友。

我们在蒋老师家以吃饭为主。我们几个人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西四能仁胡同三十六号小院。一呆一天，中饭晚饭都在家里吃。在蒋老师家才知道吃饭是多么有趣的事。总有很多人，热热闹闹的，总有好多菜，现在回忆，都是家常菜，就是香喷喷。我自己家里长辈都不太会做伙食，记忆里我就是吃食堂长大的，所以很多菜都是第一次吃到，像霉干菜烧肉，鲜、香、油水足，拌饭吃，再加上一两勺蒋老师自己做的桂林辣椒酱，妙绝，我不吃三碗白米饭绝不罢休，就是一棵大白菜，丢一块豆腐一把虾皮熬，也是鲜得不得了的好汤。蒋老师曾在武汉大学读书，牢牢记得洪山菜苔之美味，于是寒假后回校，我会带洪山菜苔，我会站在锅台边看蒋老师把腊肉煮熟了切成薄片炒菜苔。菜苔颜色都没怎么变，就入口了。现在想想，蒋老师是怎样操持这么多饭的！得花钱，花精力，还得有管理才能。老太太跟我讲，她十三岁就开始管理一个大家庭了。还是在流亡的路上。更不可理解的是，我居然

就这样吃吃吃，一直吃到大学毕业！从来没有过一点点不安！准确地说，是蒋老师和刘伯伯从来没有让我感到一点点不安。尽管后来他们已经明镜似的知道我不是个搞戏的人才了。

吃饱了饭，还有戏看。这时候我开始进剧场，幸运的是跟着蒋老师和刘伯伯进的剧场，当然看到的是好东西！我可没有想到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好的戏。印象深刻的有上海昆剧院的折子戏《挡马》、《下山》、《弹词》、《醉写》，俞振飞的李白！成都市川剧三团的《斩杜后》、《逼侄赴科》、《踏伞》、《金山寺》，有陈书舫和晓艇！陈书舫我记得王朝闻在《一以当十》里点评过！还有来自山西临汾的青年蒲剧演员任跟心、郭泽民、崔彩彩的传统戏。我特别高兴在蒋老师家和跟心他们一起吃饭，认识他们。他们那时候那么年轻，那么纯朴，那么真诚。我一直没真正地懂戏，我喜欢演戏的人多过他们演的戏。

还会跟着蒋老师和刘伯伯接待客人和拜访客人，我记得在家里接待过杨兰春，就是那位豫剧《朝阳沟》的作者。他喜欢蹲在地上聊天，甚至吃饭也蹲着。有一次去翁偶虹先生家，我一进门就看见一副玻璃盒子里有极漂亮的泥人造型（也许是面人儿），一个古代盛装的仕女，脚边摆了一个骷髅头，很惊异，听老师们说，这叫“红粉骷髅”，印象极其深刻。所有的活动，我都是和宇锋一起参加的。我们还筹划了北大戏曲爱好者协会的成立大



会，由蒋老师和刘伯伯出面，请了京城的戏曲大腕们到北大来，想想，这样的大家，来一个都不得了，可是，那一回，居然来了一车子的人，居然是一辆大公汽把大伙儿拉来的。1981年，除了那样的大公交车也找不

到别的大车了吧，我们在北京城里绕来绕去，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人接齐了。当然这也是北大有面子。可是后来这协会也没有什么活动，只是我们在蒋老师家的吃饭时代从此开始了。

我和宇锋的友谊，是我大学时代宝贵的记忆。虽然毕业之后也没有见过几次，不过他带给我的温暖的感觉，从来不曾消失。可是，当他去世之后，看着他的遗容，突然感到我们可能轻视了他内心的痛苦，来自疾病的折磨和死亡的预感，记得他曾说，他这个病，医生说活过三十都是奇迹。可是知道又能怎么样？只能在一起玩就痛快一点。

2006年，他约我做一个口述史，是作家梅娘的，我知道他工作的意义，他也觉得我去采访这位女作家是最好的人选，于是我去了北京，他很开心。可惜第一次见面感觉并不好，和梅娘话不投机，我知道主要问题是我准备不足，我一时也不可能准备充分，问错了一些问题，老太太不高兴，深层原因是出发的当天就接到电话，说儿子第一天上幼儿园就被接丢了，我内心十分不安，根本不想干这个活了，第一次见面后，我跟宇锋说，这事我干不了，老太太不配合。然后我速速回了武汉，毕业之后我们俩唯一的一次合作不了了之。他大概对我很失望吧。工作对我来说可有可无，不那么重要。对他来说，也许是和自己不完美的人生较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可退让的。我还是有点遗憾。 ■

【北大校友】

天堂里的笑声

女 真



2017年初，一个寒冷的冬夜，我被一阵爽朗大笑惊醒。醒来环顾，四周黑着，路灯的光亮从窗帘缝隙隐约透进一缕。身边无人，笑声显然来自梦境。梦是心中想，我反应过来，我是梦见宇锋了——他是我认识的唯一这么大笑的人。

跟老同学宇锋，最后一次见面，是2015年的夏末秋

初。那时我们毕业30年。聚会、喝酒、热闹。分手的那一天，我们宿舍四姐妹回燕园游走、怀旧。午饭在北大东门的一家饭店，他大老远赶来，坐轮椅，护工推着。知道他不为一顿饭，只是想多见老同学一面。30年前的大学同学，年过半百了，国内国外，天各一方，见上一面，不容易。

1982年的夏天，大二暑假，我们六位大学同学曾经一起徒步，去承德旅行。那时我们青春年少，十八九岁，生瓜蛋子，没有徒步经验，黑下不睡、天亮晚起，每天顶着大太阳走路。那时他的身体已经暴露出问题。毕业以后，他动过大手术，后来竟坐上了轮椅。一个正当壮年的男人，自己不能独立行动，出入需要护工帮助，那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遭逢糟糕的身体境况，总归有一份不如意、悲凉甚至悲怆在里面，但每次见面，我在他的脸上几乎看不见愁容，即便偶尔谈到自己的病况，他也总是一带而过，笑眯眯怂恿我再讲几句赶劲、好玩的东北土话，接下来他就会开心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嘴巴张到不能再大，宽硕的大脸盘子上，眼睛笑到看不见，俨然大肚弥勒佛。



大学毕业以后，我去北京开会、公干，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他秦老胡同的住处。有时就是碰巧路过，去打个转转，看上他一眼。也有几次是专门去看他。他那个住处，经常人来人往，十分热闹。每次去北京，一想到东城区的胡同里还有一个老同学的家让你随时可

以敲门，还有那种老同学的哈哈哈哈大笑声迎接你，对雾霾的恐惧多少能缓解缓解。

2013年的春节过后，听说他刚刚去医院抢救过一次，再次担忧他。到北京开会，给他打手机，居然通了，他已出院。去秦老胡同，他妹妹宇玲也在。宇玲的女儿，已经上小学

了。小丫头聪明伶俐，宇锋视如己出，喜爱有加，谈起她的种种趣事充满了娘舅的慈爱。

2016年的最后一天，宇锋入院抢救，再没醒来。这样的消息，让我泪流满面。尽管早知道他身体不好，不止一次住院抢救，但这一天真的来临，我还是悲伤难抑。他是我大学同学里第三个离开人世的。前面两个同学，都是自己主动了结。宇锋不是。他虽然身体一直不好，但爱惜生命，积极治疗，去世前不久，还在微信里晒自己锻炼手指的照片。他以病残身躯，一直在做事情，虽然我对他具体在做什么，其实并不了了。大学同学，毕业以后进入不同的行当，跨界的居多，在事业上真正了解的有多少呢？维系友谊的基础是同学四载、青春记忆。任何一次见面，只要讲起1980年代的同学往事，话题不会断。

宇锋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好同学。再去京城，已经没有勇气和理由去敲秦老胡同的大门。京城里少了一个可去之处、可看之人，魅力将打折扣。黄河三角洲，山东东营，正像我们宿舍的美女郑梅所说，从前对我们来说只是地图上的抽象地名，但从此不是了，因为宇锋长眠在那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奈何不得，违背不了。总有一天，我们都将归去。不同之处，先走的人有老同学悼念；晚走的，可能世上除了至亲已经无人再识，认识你的人，都已经去了另外的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讲，活得太久也许不算好事，宇锋也算有幸？至少他还有好同学大老远赶去送行，还有亲同学约好了一起凭吊。

人是肉体凡胎，渺小得很，并不比大自然中的一滴水珠更高贵。东营有油田、有黄河滩地，接纳了来自黄土高原的流水、风尘，通向更广阔的大海，是个好地方。宇锋最后生活在那里，长眠在那块土地上，愿他安息。人生总有归去的一天，我们来过，我们笑过，就这样。听说现在的墓园很贵呢，宇锋同学，你牛，先有归处了。

那个寒冷的冬夜，我被睡梦中的笑声惊醒。醒来后，我明白是梦见宇锋了。

愿他在天堂。不冷，没有雾霾。 ■

【北大师友】

宇锋，我不想说再见

郑梅



直到今天，还是不能相信：宇锋，那个会叫我六狗头的人，真的，真的消失了。我竟然没能来得及跟他说一声再见。

最后一次跟他聊天，还是他离开的两天前。我发照片在几个朋友的微信群里显摆一盆正在盛开的文心兰。宇锋调侃说，能对付雾霾吗？给发过来吧。我说，你先飞过来试试除霾效果呗。宇锋是能一起聊天的朋友，怎么聊都是愉快。

2016年最后一天，我先生从微信群里得到的消息，把我从梦中惊醒过来：宇锋过世了。那天早晨特别的黑暗、清冷。我楞在那里，直到各个渠道的消息都证实了他的不辞而别，还是愤然不肯相信。宇锋，不会这么不哥们儿的！太不仗义了！怎么能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呢！眼泪不争气地就这么流呀流呀，流个不停。宇锋，我不想说再见！

宇锋是那种特别温暖的人种。那种毫不世俗、清澈透心的温暖，在我离开中国的多少年后，一直让我深深地想念。从来没有叫过他大哥，再次见面时，我拍着他的脑袋叫狗头。他笑眯眯地，直叫我六狗头。现在想，如果我有一个哥哥，真希望就是他这样的，善良、宽厚、幽默、真诚、睿智，耐心地接纳各路朋友。

我在中戏读研的那几年，他秦老胡同的家就是我们这伙朋友的家园。

刚搬进中戏的学生宿舍，各种人生地不熟的时候，能想象到宇锋笑眯眯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情形吗？天呀，那简直就是直白的幸福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可能是中戏太小，研究生也总共没几个吧。宇锋说，六头，带你认认门，没事就流窜过来玩吧。夏日黄昏，我们就从东棉花胡同溜达到秦老胡同。我认真地流窜了好几年，直到离开北京。



某一年的六月，我曾经流落到秦老胡同住了好几天。那个特殊时段，宇锋家住满了朋友。宇锋的家就是这么无条件向朋友敞开着。他是一个热力引体，大家都这么自然而然地流

向他，形成一个圈子，抵御外面世界的冰冷和荒诞。那个四合院不大，但因为宇锋的真诚为人和宽厚的心胸而容纳了太多太多的友情。

从大学同窗到前年夏天最后一次见到他，宇锋几乎没有一点儿变化。他身体一直不好，手术不断，病魔缠身，但你看不到他的疼痛和哭泣。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了各种困顿，但你看不到他的颓废和挣扎。他始终笑面人生，或微笑，或仰头大笑，他永远是那个温暖的人种。记得，有一回跟他提起，我先生对他这么多年来所做的口述历史评价极高，称他真的是在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跟他说，狗头，不得了呀，你有铁粉了。宇锋笑嘻嘻地说，哦，那我可得端着点儿了。我们俩一起笑翻了天。那个笑声还没有落地……

我宁愿相信“宇锋已经离开”只是一个不真实的传言。所以，我不想说再见。■



2015年3月8日宇锋与北大中文系系友合影

【文衡同仁】

宇锋，说走就走了

冯敬兰

2016年最后一天，吴迪电话里告诉我，李宇锋昨晚走了。我说，昨天早晨我还看见他更新微信了呢！怎么说走就走！？



其实过去的一年里一直有李宇锋病情危重的消息，我始终不愿相信，他那么年轻，同样是腰以下截瘫，张海迪成名时说自己只能活到28岁，现在人家都年过花甲了还日理万机呢。有一次我给他发短信问候，他立即从东营打电话过来，非常热情，连说没事儿，待回京后一定见面叙叙。

我和刘进去看宇锋的那天，是2016年8月1日，天气闷热，他让助手将房间的空调调到很低的温度，我感觉相当地冷。他的手软绵绵地垂在轮椅的把手上，我上去握了一下，心不禁一沉，怎么一点儿肌张力都没有了？莫非他脊髓的病变又往高处蔓延了？我脱口问道：你的病有发展吗？他竟是笑着点了点头，大难临头见怪不怪的表情。

几天来，李宇锋的那个笑脸总是浮现在我眼前。那天为什么不和他多聊聊呢？我和刘进把各自带去的书籍资料送给他，我说我的一篇文章写到你，你的名字是山峰的峰呢，还是金字旁的锋？他说当然是金字旁，学雷锋嘛那一年（指他出生的1963年）。坐了一会儿，眼看快中午了，我俩赶紧告辞。李宇锋不舍地说，就呆这么一会儿啊？还没聊什么呢，你们还有别的事吗？我们说没有什么事，就是怕你累啊。屋里那么冷，也担心他万一感冒了。皮肤对温度的感觉差异，譬如对冷迟钝对热敏感也是脊髓神经病变的一个症状。

真后悔那天为什么不和他多聊聊，一起吃顿饭。宇锋是为了和我们见面，特地从家里赶到秀园的。

也好，毕竟是回到了父亲一手创建的石油城东营市，毕竟是回到了父母的身边。认识李宇锋几年来，凡是打电话找他，大都是在东营的家里，先是在守护母亲，然后母亲去世了。过了两年，父亲也走了。作为孝子，他以病残之躯陪着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再过两年，他终于摆脱病痛的长久折磨去找他的双亲了。放下一切，说走就走，好啊，宇锋！

和宇锋虽然只是几面之交，可是在心里我一直觉得他很亲近。我在石油系统工作近30年，而他是老石油的后代，这是天然的渊源。他的父亲李晔作为余秋里的秘书，1958年从部队转业，参加过大庆会战、江汉会战，担任过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原油田、胜利油田的领导，一手将胜利油田的总部所在地东营打造成一座繁华的城市。

我在网上寻找李晔的信息，看到了许多真诚怀念这位石油界老领导的文字，譬如：“有李晔，东营才成了地级市，否则可能现在是滨州市的一个区。”“李晔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身正气，从不考虑家事，一心为国家为油田为人民着想，为我国的石油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表里如一，上下一样，人前人后一样，说的想的做的一样，胸怀坦荡，值得我们学习。”我在李宇锋身上看到的品质和教养，正是来源于这样的父亲。

然而，我认识李宇锋却和石油无关。他是最早关注到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八五事件”的年轻一辈，他不仅出资、出力，还在喧嚣中做一个诚恳耐心的倾听者。记得有一次他说到王晶垚先生（卞仲耘校长丈夫）来，和他说了一天，累得他在轮椅上实在坐不住了，只好躺着听老人说。宋彬彬因在1966年8月18日给国家主席毛泽东戴袖章一事而成为文革标志性人物，多年来传说不断，2007年9月因实验中学90年校庆被评为荣誉校友再次被推入舆论旋涡。就在这样的情境下，李宇锋走近宋彬彬，作为倾听者，是多年来第一个获得宋彬彬信任的陌生人，她对这个年轻后辈敞开心扉，讲述了几十年来憋在心里的真实经历。

2005年冬天，徐晓、刘自立、田晓青几个人在北沙滩胜利饭店就女附中文革初期卞仲耘校长之死采访我和许容（我的中学同班同学），比之她们我更熟悉这里，徐晓说，是一个资助她们调查的朋友提供的地方，他父亲以前是胜利油田的领导。

2006年8月5日，李宇锋资助的卞仲耘校长诞辰90周年、遇难40周年纪念会在京举行，他是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与会者有著名学者和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李普、吴象、谢韬、郑仲兵、周倜、严长俊、何燕凌、田晓青、刘自立、徐晓和女附中老教师林莽（陈洪涛）、1966届在校生叶维丽（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历史教授）、于羚（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文革资料），以及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和子女等。会上放映了胡杰拍摄的纪录片《我虽死去》。可以说，在此之前之后，师大女附中（今实验中学）或任何官方都没有举办过类似活动。

2009年的一天，徐晓带着我到秀园去见李宇锋，我们一起策划了由亲历者、目击者回顾八五事件的座谈会，让宋彬彬第一次公开说出自己的文革经历。那天是2009



年6月16日，不同年龄、经历，不同立场、观点的十余人坐在一起，回溯1966年8月5日那天及前后，师大女附中校园里发生了什么，也听宋彬彬述说她的文革经历。窗外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李宇锋作为东道主，和我一起主持了这个座谈会，还招待了大家的午餐。会后不久，他就把根据录音整理的座谈会七万字的发言稿送到了我们手里。2010年4月，以文革研究为主旨的网刊《记忆》47期择其精要予以发表，既后来在网上多处转载的“五人谈”版本。同年8月，《炎黄春秋》以《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说法》为题，发表了“五人谈”中的“八五事件”叙事部分。在此之前，2004年我校1968届高一三班王友琴在香港出版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专辟一章披露《卞仲耘之死》；2006年我校1966届初三三班叶维丽在美国发表了英文论著《卞仲耘之死》。

2010年11月2日，网刊《记忆》主编、文化学者吴迪和李宇锋在秀园再次召开编前

会，为女附中文革专辑（三）组稿。到会的不仅有女附中老三届校友，还有独立制片人胡杰和青年学者胡泊等。

李宇锋是油田的孩子，文革爆发之际，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开始记事的年龄，文革疾风暴雨的时期已经过去。他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商品大潮已经开始席卷中国大地。说实话，文革和他本没有什么关系。

李宇锋的可贵就在于，他以病残之躯和半生精力开拓和固守着一片特殊的天地。像他这样投入财力和精力于文革调查与研究的年轻一辈，当今中国又有几人？他是上天派来的吗？只为引导和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不要放弃。

宇锋，你结束了使命，回到了原来的家园。2017，你不来了，我看不见你放下一切的轻松微笑，我看不见你自由的灵魂在飞翔。

谢谢你！■

2017年1月10日

【文衡同仁】

怀念李宇锋

丁东

2016年岁末，李宇锋在雾霾重重中于山东东营突然辞世。继周伦佐之后，又一位在推动文革研究方面作出独特贡献的朋友撒手人寰，让我不禁悲从中来。

宇锋生前著作不多，在社会上也不出名，在网上甚至搜不到他的履历。但他的学术贡献，却不应当湮没。



二十多年来，文革研究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高风险的学术领域。官方处在高度戒备状态，文革基本上成为难以涉足的雷区。学者和媒体因为研究文革受到打压的事情时有发生。《焦点》、《东方》、《炎黄春秋》等期刊，因违背官方意志反思文革，先后遭到灭顶之灾。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研究文革，只能在民间低调进行。这时，先后出现了三个互相支持、独立运行的电子刊物，成为传播文革研究信息，积累文革研究史料，交流文革研究心得的平台，有力地推动了文革研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

这三个电子刊物就是《往事》、《记忆》和《昨天》。其中《往事》诞生最早，每期一个主题，刊发一两篇有份量的文章。最初印过纸质小报，以后以电子形式不定期发布，至今共有130多期。我没有打听过其全部参与者都有谁，只知道精神领袖是郑仲兵先生，而日常的主持者就是李宇锋。

李宇锋毕业于北京大学，患有疾病，不良于行，只能坐在轮椅上活动。他创办文衡文化中心，十几年如一日，不仅主办《往事》，还多次召开高水平的学术讨论会，受到史学者发自内心的敬重。

我参加过三次文衡中心发起的学术讨论会，一次时值文革五十周年，一次是纪念王年一先生，一次是讨论林彪事件。每次会议都开得朴素而紧凑，邀请多位在相关领域的前沿学者，畅开思想，认真切磋，因为新见迭出，大家都感到颇受启发。而会议的场所就在文衡中心并不宽敞的客厅里，中午每人一份快餐盒饭，下午继续讨论。宇锋在会上并无高谈阔论，更多地是为大家服务。

文衡发起的讨论会，选题都有很高的历史见识。不论是讨论王年一的学术贡献，还是讨论《邱会作回忆录》史料价值，都具有填补重要学术空白的意义。还有一次讨论有关华国锋的史实和评价，我没有参加，事后看到报道，也是高层次独创性的学术研讨。

我2014年底到《炎黄春秋》担任执行主编。上任后就想到向阎长贵先生约稿。阎先生给我提供的稿子便是他和李宇锋一起对担任过江青服务员的周淑英、赵柳恩的采访。这篇文章原文有五万字。《炎黄春秋》原计划分四次登载。但登了三次以后，再无下文。阎先生把第四部分给了我，并介绍我与周淑英电话联系。我认为史料价值很高。讲的都是江青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对于大历史来说，意义不可小视。因为江青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位置，了解她如何为人处事，有助于从一斑认识体制的全豹。这些当年为江青服务过的人，都是中央机关的退休干部，口风很严。若非担任过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出面，她们一般不愿意述说当年高层的内情。李宇锋和阎长贵先生共同进行的采访，是不可替代的口述史学活动。

我把这篇稿子编好，终审时却没通过。因为《炎黄春秋》一位颇有威望的编委，不赞成一再刊登有关江青的遗事。我无奈，只好请阎先生换了一篇评论《王力反思录》的文章发表，而宇锋付出了心血的这篇口述历史，只好转到其他刊物去了。其实，对于杂志的发展来说，披载这些第一手的独家史料，才是最有价值的。每念及此，我便对宇锋怀有歉意。

李宇锋只有53岁。周伦佐也不到65岁。在当今时代，他们都属于英年早逝。但我相信，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注定比他们的生命更长久。■

2017年1月15日于北京 香堂

【文衡同仁】

他是一个最苦最难的义工

——痛悼李宇锋

何 蜀



用湖南朋友陈益南的话说，我们这些从事民间文革研究的人，都是义工。确实，我们所做的事，不管是研究、写作，还是采访口述、整理回忆、录制资料，都不但没有稿费、课题费、车马费（旅费），还经常得自己倒贴费用，更不用说花费时间精力了，也更不用说经常会受到的有形或无形的打压了。纯粹因为个人兴趣和历史责任感的驱使，才使我们乐此不疲地不愿放弃，而且还要时时自感乐在其中。宇锋，是我们这类义工中最苦最难的一个。因为他身体有严重的残疾。

我是在2006年3月与他第一次见面时才意外知道他是残疾人的。当我看到他从坐的地方艰难地撑起身来却不能挪步，当我握着他的手时感到手指的明显变形，我都心中暗惊——因为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也没有谁对我讲过他的这一特殊情况，跟我谈起他的人，都只是对他表示钦佩，赞赏，认为他了不起。

介绍我认识宇锋的是康国雄老先生，那个“蒋介石的干儿子”。他的父亲是陪都时期重庆有名的民营企业家、金融家，后来当然就被当成了“大资本家”，又被打成了“大右派”（在后来“右派改正”时还差点要把他留下来作为不予改正的样板以维持“反右”运动正确的结论）。康国雄就是这样一个“黑色”出身，再加上莫须有的“蒋介石的干儿子”罪名，使他在“毛泽东时代”一直受到打压。2004年秋，我为他整理完成了那本既沉重又有趣的回忆录（《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的传奇人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在那期间，他通过他的中学老同学刘家驹（时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结识了李宇锋。当他得知李宇锋他们创办了民间刊物《往事》时，马上就打电话告诉我，问我要不要。我也就结识了《往事》的执行主编李宇锋并得到了每期寄赠的刊物。但康国雄、刘家驹都从没提到过宇锋的残疾，康老先生只

是跟我念叨过多次：应该有人研究“李宇锋现象”。因为在他看来，李宇锋这样一个红色家庭出身的干部子弟，却不去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去“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完全背离了“党文化”的长期培养教育，专心致志、冒险犯难地从事还原历史真相、探讨社会变革之路的活动，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异常现象吗？

我后来才知道，宇锋因病致残之后，没有消沉，也没有赶紧“消费人生”，向社会索取“补偿”，而是更加心无旁骛地向社会付出。他和郑仲兵老师一起创办了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这个“中心”从不做生意，只是为了在不能自由结社只能自办中心的时代条件下注册登记方便。编发《往事》就是他们事业的起步。那时网络通讯还不普及，特别是在老年人当中（而这又是《往事》的主要读者群），因此《往事》最初只是他们自己印出来寄送赠阅的纸质小报，以后才发展成为通过网络传播的电子刊物。从2004年9月28日出刊的第1期《漫谈文革座谈会》开始，到2016年12月8日宇锋发出的最后一期，已经出了134期，其中大多数内容是关于文革的研究与回忆、反思，此外还有关于现当代历史的一些回忆、反思与研究。《往事》的组稿，选稿和编辑，基本上都是宇锋和郑仲兵老师商量后由他具体做的，每一期发一篇或一组文章，前边都有一则“编者的话”，我曾对宇锋说，我拿到《往事》后，首先就是急忙看“编者的话”，先睹为快，因为都写得非常睿智、犀利，让人获益匪浅。那些“编者的话”多是由诗人朋友田晓青起草初稿，宇锋最后推敲修改定稿的。当我了解到宇锋的残疾状况之后，才知道他编发这个刊物是多么不易：他只能用一个手指头去敲击电脑的键盘……

以《往事》第16期（2005年6月9日）为韩钢教授的《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下）》所写的“编者的话”为例：

历史的叙述脱胎于神话传说。在各种文体中，只有神话的自圆其说不容置疑，因为它不必在现实中求证。在蒙昧闭塞的远古时期，它往往被用来证明统治者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亦使族群获得认同。我们从官方史学的论述中，仍可辨认出这类远古的遗迹。

在这个开放的时代，这类有关权力起源的神话，既然打着历史的招牌，就不得不在求证中受到考验，结果可想而知。

从历史上看，为迎合一时的政治需要，官方史学一次又一次地涂抹历史（从“开天窗”到“换头术”，从吹捧“处理决定”到赞扬“平反决定”），每次都要加盖上“历史决议”的封印，为历史规定标准答案，好像如此一来，历史就会以最称心如意的方式固定下来。结果常常是墨迹未干，就又不得不拆开重来……

造成如此尴尬局面，官方史学有两大难言之隐。一是治本朝史的束缚，它面对的是一脉相传的家族，虽然路线方针政策今昔霄壤，是非善恶功罪朝夕径庭，叙述起沿革，史家却只能“装修”，绝不能“新建”——“装修”也得小心，“承重墙”是碰不得的；二是信息时代的挑战，文明日进，知识普及，信息共享，传统的封闭思维及手段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显而易见，官方史学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对它的要求。它现在的功能与其说提供记忆，不如说提供遗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它自己被边缘化，被遗忘，陷入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

与官方史学的式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独立研究的兴起。这一兴起是前瞻性的，它反映出更深层更广阔的历史潮流：思想领域的开放以及独立思考的权利。

相对于“政治上正确”，独立研究更在乎历史真相；相对于“历史辩证规律”，它更关注寻常的逻辑；它的判断并不建立在高深的历史目的论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通人的良知之上。与其说它想建立一部能自圆其说的历史，不如说它开放了这一领域：有共识，却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并且随时准备容纳和探讨不同的观点和新的发现。在这里，“说法”一次次被质疑，“结论”一次次被颠覆，引起关注、探索和讨论，真相不断地大白于天下，历史被重新发现，重新叙述……

又如《往事》第13期（2005年4月15日）为唐宝林教授《中国托派概述》所写的“编

者的话”中这几段：

在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一经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便产生出如下两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挂马克思主义的羊头卖农民起义的狗肉，一伙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了一场几乎没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驴唇对中国现实的马嘴，发动了一场莫须有的无产阶级推翻莫须有的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

.....

如今，世界的发展并未验证马克思的预言，“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全球最富裕、稳定的部分，世界产业结构的变迁使作为正义的承载者和历史的推动者的工人阶级被边缘化，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不复存在，这使得历史上那些关乎历史方向的重大的论争失去了意义。在中国，工人阶级从名义上的国家主人沦为真正的弱势群体，“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也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与时俱进地一再延伸。

几乎每期《往事》都有这类启人深思的“编者的话”。

2006年是文革爆发四十周年。当年2月24日，宇锋给我发来邮件说：“今年，我们准备组织2-3次小型文革座谈会，何兄能否在百忙中来凑一次热闹？当然，往返机票及在京食宿由我负责。请何兄斟酌。”我很快回信说：“所谈事甚好。已有朋友邀我下月下旬到京一次（也是这方面事），我正在想费用和食宿怎么解决。我也不能多逗留，因杂志事还忙，今年第三期是一百期，主管方面打算要庆祝一番。目前杂志社三人中我是唯一编满一百期的人（其他老的都退了）。”我信上提到的“朋友邀我”一事，是徐友渔、崔卫平、郝建他们发起在京召开一个民间的文革四十周年研讨会。我那次去京赴会，就在宇锋的中心下榻，往返机票也是他给我报销的。

那就是我同宇锋的第一次见面。那次除了参加徐友渔他们那个研讨会外，还在宇锋的

中心参加了一次小型研讨会，有郑仲兵老师和徐友渔、卜伟华、吴迪（启之）、吴小龙、舒云、刘家驹，以及正到北京出差的文革时重大八一五的战报主编周孜仁等参加。此外，宇锋还请来了阎长贵老师与我见面，又通知了刘自力、刘双兄弟来面叙（我们都是已经有过几年邮件联系交流却未见的朋友）。他还特地带我去拜访了王年一老师（那是我与王年一老师唯一的一次见面）。

宇锋还安排我去见了林立衡（豆豆），那次有郑仲兵、刘家驹二位老师一起，大家与林立衡作了些交谈，吃饭时，林立衡叫来餐馆的大堂领班杨大姐跟大家见了一面，杨大姐的父亲就是当年林彪的小车司机杨振纲（跟林彪一起乘256号飞机葬身于蒙古温都尔汗的那位忠诚的军人）。当然还见到了被林立衡视为干娘的王淑媛老太太——当年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老太太跟我们聊天中反复强调：“首长是个好人，首长是个好首长……”还在大家要求下表演了她曾为给林彪解闷而表演过的教幼儿园小朋友跳的舞蹈……

当时正值邓力群那本在香港出版的为其反改革观点进行辩护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在内地私下流传，宇锋他们复印了一些提供批判。有一天我跟宇锋一起出门时，看到他那小会议室里有几个老干部正凑在一起讨论文稿，宇锋笑着对我说：“他们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然他说的“批邓”是指批判邓力群——那位满口马列主义，在当年“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把别人打成“特务”却把别人的妻子“抢救”到自己炕上去了的“左派理论家”。没想到宇锋他们复印邓力群书的事给他们中心带来一点麻烦，就在我刚离京返回重庆之后，就听康国雄老先生来电话说，宇锋的中心被查抄了。原来当时中央在追查邓力群这本“禁书”在北京的流传，追到宇锋的中心，就进行了查抄并传讯了宇锋。我赶紧打电话去问宇锋情况怎样，他笑呵呵说没事，还说，他一去，见到那些威严的比他年轻的执法人员，就调侃了一句：“看见你们格外亲……”《看见你们格外亲》是宇锋上小学时，文革后期广播电台里经常播放的流行歌曲，以农村老大娘的口气赞扬下乡帮助秋收的“人民子弟兵”。对于宇锋这样的“红色后代”来说，那些执法人员是维护这个“红色江山”的，当然应该是“格外亲”。不过那些人可能很难理解宇锋为什么

竟也成了这个政权维稳的防范、打压对象。

此后不久，宇锋编发了《往事》第44期（2006年9月29日），发表了三位老干部的文章：李锐《关于上书赵紫阳、邓小平反对邓力群任总书记的经过》和《吴江致邓力群同志的信》、冯兰瑞《五问邓力群——据〈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对邓力群的沽名钓誉欺世盗名进行了严肃的、有理有据的批评。《往事》在“编者的话”中说：

那么，一个道德有缺陷的人，何以充满道德上的优越感，一路扮演“左派”、扮演“抢救者”的角色而不知反省呢？

这一怪现象不光跟个人的私德有关，还跟一贯左倾的党文化有关。有些投机者并不真的相信他们自己鼓吹的左的一套。但他们知道，在这个党内，只要站在左边，就是抢占了有利地形和道德上的制高点，就可以当整人的“抢救者”，就可以利用党内斗争去争权夺势，以获取一己的私利。

左边还有一个优势，因其“立场正确”，就可以从预设的立场出发，罔顾事实和逻辑，得出唬人的结论。比如腐败和两极分化明明是由缺乏民主监督的专制主义造成的，但“抢救者”们却把这种现象归罪于所谓的“自由化”，并反对人民监督当权者的民主权利。由此可知，他们并非像某些人们以为的，是反对腐败和两极分化，相反，他们竭力维护的恰恰是腐败和两极分化的政治根源。

讽刺的是，这本鼓吹专制主义的书无法在内地出版，只能以私下复印的方式流传，使得这位“抢救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没有起码的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的体制下，就连鼓吹专制，抵制民主和自由的文字都没有出版的自由。

宇锋大学毕业后，本来也是个前程似锦的“红色接班人”。但是八十年代末那次划时代的、震惊了全世界的枪声，令他痛心疾首。他曾跑去找他父亲的一位老首长，那是他一向尊敬的“革命前辈”。当他诉说了思想上的困惑之后，那位前辈却毫不留情地说：“对

这些人就是要镇压！”宇锋告诉我，他从此不再上那位前辈的门。也许，从那个时候起，他就自愿退出了“红色接班人”的行列，开始反思自己和父辈走过的道路，并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转向了中国现当代历史。

在新世纪之初，宇锋他们一边自编自印《往事》，反思历史，进行思想启蒙的交流、传播，一边组织各种研讨会、座谈会，还千方百计请来了北京地区的各方面文革风云人物及历史见证人（如曾在中南海服务的工作人员）录制口述资料，鼓励他们写回忆。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过的阎长贵、王广宇老师的回忆录的写成与出版，就有宇锋的鼓励、推动之功。宇锋还自己动手整理了文革中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工人造反派头头、北京工代会负责人徐铠的口述（《往事》125期），与阎长贵老师一起整理了《保健护士谈江青》（《往事》120、121期，其中部分内容发表于《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那些研讨会、座谈会、追思会，一般都是宇锋策划和主持的。

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活动的费用，都是他们那个文化中心承担的，不过他们这个“中心”因为从不做生意，不会赚一分钱，所有开销，除了朋友的资助外，就是宇锋他们自费，其中主要是宇锋自己在朋友的企业投资的分红。可以想见他们的坚持是多么不容易！后来因为经济的原因，难以再聘用仅有的两三个工作人员，宇锋不得不关闭了文化中心，但他仍然坚持编发《往事》，并断断续续整理一点以前录制的资料……

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在宇锋突然离开人世的三个月前，2016年9月，他离京去山东老家治疗的前夕，他还策划并成功地在京郊某地召开了邵燕祥创作七十周年研讨会，请到了京城一批有名的学术名流，其中不少人也是随时受到“维稳”监控的“敏感人物”，研讨会十分成功。钱理群先生在悼文《痛失李宇锋，我能说什么》中写道：“在讨论结束时，宇锋作了一个极动感情的发言，表示希望以后还会有这样的聚会。”但谁也想不到这是他策划并主持的最后一次研讨会。当时正值文革五十周年这个“敏感年”，特别是在京城，要想举行一次民间的学术研讨会有何容易！清华大学老五届的校友们要聚在一起反思文革历史，从世界各地来到京城后，却被阻挠不能开会，甚至他们改变计划另找餐馆一起

吃饭，也在联系好餐馆之后突然被通知不能向他们供餐；中央党校的老干部杜光与几位老友的定期餐聚，也被强行取消……而宇锋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用启之的话来说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成功召开了一次民间的较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难怪郑仲兵老师在悼念宇锋的信里说：“他以严重残疾的身体，做了那么多健全人所难以做到的事。”

他思想的深邃，精神的乐观，谈吐的幽默，往往使人忘了他那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的残疾之身。

2012年秋，我因事去北京一行时，与他和郑仲兵老师、吴迪、卜伟华、小戴等小聚了一次，那时我发现他的身体更糟糕了，当我们一起坐车到达郑仲兵老师家门外下车时，他迟迟没有下来，原来他久坐之后，得先平躺下去，缓过一会儿，才能起身由人搀扶着下车。我看到他那个样子，心里十分难过，也深为他担忧，但是此后每当我问起他身体情况时，他仍然十分乐观地回答我很好。

2016年12月8日，我收到宇锋发来的《往事》第134期。此前我已知道他去山东东营作治疗，以为这段时间他不会再编发刊物了，但没想到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还在坚持！当时不可能想到这是他发出的最后一期《往事》。我给他回复邮件说：“宇锋兄：发到我两个邮箱的《往事》都收到了，非常高兴！知道你还在‘继续革命’，令人欣慰。刘家驹老师的情况可能不大好？……”刘家驹老师从解放军文艺社退休，自《炎黄春秋》创办时起就担任了副总编，以后又担任过几年《炎黄春秋》的执行主编，跟宇锋是忘年交。刘老师把自己的几十篇文稿都交给宇锋帮忙整理发表（已经在《往事》第75期发表《往日军旅性见闻》和第103期发表《我经历的朝鲜战争（外一篇）》）。在宇锋离京之前，刘老师已经因心脏病住院抢救。

很快收到宇锋从手机发来的回信：“何兄好！相信彼此都在勉力挣扎，只要有一点空间，断不会轻易言弃。刘老师大概已经出院半个月了，这次侥幸，估计也是风烛残年，来日堪虞。所有未刊稿，命我修订并委托将来，其实以我的基础，欲做廖化尚且不合格，深感沉重！窃恐届时还需何兄指教。我到东营住院康复肢体已月半，估计大致得一年左右，

也算一次‘重点转移’吧。这里日程较满且网络不畅，一般平时忙于‘武斗’，只有周末可以腾挪‘文斗’一二，呵呵。何兄保重！”

他信中说我们都在“勉力挣扎”，指的是我们所从事的还原历史真相、反思历史教训的事业，是在被某些权贵势力视为大逆不道、处处设置禁区的形势下艰难进行的。然而对他来说，则不仅是在事业上“勉力挣扎”，而且还得在日常生活中“勉力挣扎”，远比我们苦得多，难得多！

他的最后一则短信是12月18号——他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十二天之前发来的：

何兄：估计刘老师的身体状况已经很难再做认真修订了，一叹！咱们都保重，如顾训中老师说的：争取活着看到结果。呵呵。 宇锋

万万没有想到，就在2017年新年前夜，我接到小夏打来的电话，说宇锋已经去世，微信群里已经在传了。我大为震惊！给郑仲兵老师去电话，打不通（后来才知道郑老师在香港），给刘家驹老师打电话，占线。我干脆给宇锋的手机打去电话，是他请的护工接的，证实了这个噩耗……

那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宇锋的离去，给那个“文革敏感年”画上了一个黑色的句号。

2017年，是“反右派”运动六十周年，对于畏惧历史的人来说，又是一个“敏感年”。不过，宇锋不必再为以后这些“敏感年”忙碌了……

就在宇锋离去之后，我读到何清涟的一篇文章《保护“吹哨人”的国家才有未来》，其中有一句话使我顿生感慨：“最了解红色家族腐败的人是红二代成员，但我们看不到他们有人出来向这种体制说‘不’，相反，他们还为保护这个体制竭尽心力。”这位身居异国的作者把话说得太绝对了，太不了解中国的现实了。她不知道，“向这种体制说‘不’”的所谓“红二代”成员并非没有，李宇锋就是一个。■

2017年2月24日改定于重庆风江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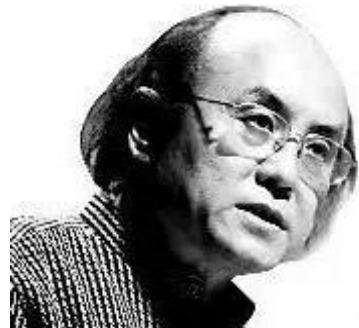
【文衡同仁】

宇锋的意义

雷 颀

宇锋走了，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意外。虽然他残疾多年，身体一直不佳，但几个月前，在网上看到他还在主持座谈会，谈笑风生，没想到，这就走了。

宇锋走了，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我与他只能说认识，仅有的三两次见面，还是在他召开的会议上“集体见面”，没有任何私交，然而，却如得到相交多年老友的噩耗，久久难过。



那几次会，都是讨论有关现代历史问题。他是商人，又是中文系毕业，“历史”与他不搭边不搭界，却对历史问题这样感兴趣，颇出意外。原来，当他一点点涉猎现代史、当代史后，感到许多“历史的虚无”，假话连篇，开始发生浓厚的兴趣。了解、知道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入，纯粹的个人兴趣，于他成为一种历史担当。他意识到，如果这些历史没有厘清，将影响到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因此，他开始并且资助现、当代史研究。他还不定期刊印了一份名为《往事》的册页，免费赠送。

喜欢《往事》的人不少，但由于免费，赠阅有限，多数不能满足。我的朋友中想得到《往事》者也很多，且明确表示愿意交工本费。对商业，我完全外行，知道他办《往事》完全不为赚钱，但也认为可收工本费，两全其美，就向他建议说应收工本费，扩大读者范围，满足更多友朋的需要。他对我说，千万不能收工本费，因为一收费，哪怕是工本费，就涉及到经营问题，登记、税收等等，非常复杂，容易出事。后来的事情证明，他确有经

验，如果当初收取工本费，那可就麻烦大了。

更难得的是，他父亲是某省副省长，他可说是“官二代”，但他绝无理所当然要接班“坐天下”的思想。相反，他关注、研究现当代史的主旨，就是为了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体制保障，中国建成宪政民主的社会，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种超越性，确实难能可贵。

从更广阔的历史脉络来看，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需要许许多多像宇锋这样有理想、有社会关怀的商人、企业家。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逐步开始了“社会重建”。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使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有所减弱，公民自主性开始提升，对许多问题开始发声，独立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意见、批评和建议。商人、企业家是市民社会的中坚，也是最大受益者，更应像宇锋那样，从“自为者”变为“自觉者”，有理想、关怀与担当。这，就是宇锋的意义。

■

2017年1月19日

我心目中的李宇锋

蒋 健



我与李宇锋认识的时间不算长，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邮件和电话联系也是偶尔为之，但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是一个坚守青春理想的人，是一个值得敬重的好朋友。

一个热情周到的人

我认识李宇锋先生有些偶然。2009年夏，老朋友丁凯文自美国回京，说好了见面聊聊。不久，丁凯文又告诉我，他约了几个搞国史研究的朋友去李宇锋的中心聊聊，邀我一同前往。8月21日上午，我比约定的时间早了半小时，第一个到了位于秀园小区的李宇锋的中心和家，李宇锋坐在轮椅上欢迎了我，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此前只知道他40多岁，创办了研究现代国史的电子刊物《往事》，没想到他的身体如此糟糕，但他热情的微笑透着几分童真，这让我有种一见如故、如沐春风的感觉……

记得那天，丁凯文是最后一个到的，他同我一样，也是第一次见到那天来的其他朋友。不过，由于主人李宇锋的热情周到，大家很快就进入当代国史研究这个主题，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事后我写了一篇《白会黑话记》发在个人博客：

20多天前和一帮搞国史研究的人聚了一下，其中有江青的秘书Y，林彪研究专家D，老红卫兵B，《记忆》主编W，《往事》主编L，他也是操持聚会的东家，……可谓“谈笑皆鸿儒，往来有白丁”，白丁即鄙人，J。

会自然是白的，为了某个未必众所周知的原因，J以黑话记之：

W详细介绍了他在国民口述史领域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特别是1957年落难者的回忆，他还介绍了他对老电影人采访过程中的一些趣闻。

Y老证实了网上流传的关于老毛对周的评价。当初J觉得语气象老毛的口气，但有一明显的史实错误，所以没敢当真。这次Y老说他自XJB处获得该评价的全文后，发给了小毛，过一段时间后，又与小毛进行了通话，小毛告诉他是真的，但有三处文字错误（这些也是J怀疑之处），并一一指正。Y老请小毛是否可以进行文字校对后邮寄过来，小毛婉言拒绝，说他这类人是不适合留下文字的。

实际上，Y老新书在国内的出版也算是个突破，打破了某部定下的藩篱。

在评价《百年林彪》时，就选材进行了讨论，特别对CZH进行了评价，D说选入的该文很有典型性，那个年代的人为了过关不得不违背良心参与造假，结果是既害人又害己。J

则认为不如选 CZH 关于刘帅谬批的那篇，毕竟刘帅比卜占亚影响大多了，更容易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而且可作为那个年代“落井下石”的典型之一。Y 老插话说，关于 CZH 当时给中央写信的事情，他间接向汪东兴核实过，当事人印象不深了，没被整是该信没上报，这也是变相保护写信人吧。

在 J 谈及王海蓉对老毛关于明批林、实批周的录音时，这在国内有多个正式版本流传，包括冀朝铸的英文书，Y 老指出王海蓉曾就此事正式发文声称是捏造，但 Y 老不记得王文发在何处了，故此 J 存疑。

在 J 问及王海蓉与唐是否是康生的人时，这是 LZM 的说法，在座诸位都不认同，B 说王与唐有自己的通毛渠道，不需要借助康，D 更是说康在庐山会议后在精神上被林彻底击垮，开始淡出政坛。对 D 这个说法 J 存疑，毕竟康在庐山会议后的 11 月 6 日被任命为那个重要的中央组织宣传组的组长，该组织宣传组类似当年的“中央文革”。无论是在周年谱中，还是林年谱中，康还是很活跃了一阵。

J 说周、康关系值得研究，重要关头二人就见面，二人联手对江、张进行反击过。康在“913”后被秘密调查过历史问题，敢下令、能下令调查康问题的只有老毛。周、康死前的见面更耐人寻味，之后周情绪反常，邓遂用假报纸糊弄周，类似当年袁大头被其长子糊弄。周、邓互有一肚子话没说，决定烂在肚子里，实际上是一肚子苦水不敢往外倒。邓后来秘密接头似地见朋友和同志，如叶帅，防谁呢？邓走前，地位很安稳，还是表示有一肚子话没说。

J 的这番话引起了广泛的兴趣，纷纷问消息来源。J 答都是各种严肃媒体上公开的，只不过是零星出现的，加上回忆人多是秘书、医生、警卫，所以没有进行深度分析，J 把这些零碎的信息串起来，得出自己的结论。

当 J 认为国内最近比较放开，并举《炎黄春秋》上刊载的 CZY 对杨尚昆和刘英的访谈为例时，B、Y 等人不以为然，说那是一次“事故”，遭到了中宣部的严厉通报批评。

当 J 说讨论交锋对研究的深入很有益，BRAIN STORM，引起了 W 的兴趣，问 BRAIN STORM

的具体含义是什么，D 和 J 进行了解释。

在讨论写历史的笔法时，W 提到《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光荣与梦想》及其作者。《光荣与梦想》这本书的作者 J 不记得，但《光荣与梦想》是 LZJ 极力推崇的书，他说过他希望他写的书能够逼近《光荣与梦想》的境界。W 提到的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新闻记者出身，所以东西写得很好看，耐读！J 说过于严肃的历史文章不会受到圈外人的关注，历史其实可以写得很有趣，比如京城孤魂和欧阳龙门，这样才能吸引年轻人。W 表示认同，并说起他同欧阳龙门近期的一个合作，还问了欧阳的背景。J 简单介绍了和欧阳的见面，D 表示奇怪，这二人怎么见的面啊？D 还关心了京城孤魂的下落。

随后 D 和 W 谈了 YRX 的情况，他目前也混迹于出版界，且有相当实力。

B 和 D 简单交流了对国内“913”研究状况的看法，B 借他人之口说 D 不了解国内的语境，这点得到 J 的认同。

B 说他在香港出书没有影响到他在国内的工作和生活。

L 认为吴胖回忆录虽然透露了不少东西，但还是不够，也许作者忙着辩诬，这可以理解，但忽略了读者真正关心的很多东西。L 还谈到吴胖回忆录出版后，他办了小型讨论会，LYM 来了。J 表示对 LYM 的钦佩，毕竟他那经历和阅历在那儿摆着呢，但 B 不认同，说 LYM 左得很，说他在“风波”后极力鼓吹防止“和平演变”。不过，J 觉得那是 LYM 逢场作戏，当然他 10 多年前的观点也许就是如此，10 多年过去了，他也会与时俱进的，J 钦佩的是他 2006 年后的一些著述。D 居然没听说过 LYM，令 J 好生纳闷。

D 对《落难英雄》的点评很精彩，主人公为自己辩护得太多了，过犹不及！

Y、D、W 都谈了和 XJB 见面的感想，但由于 J 与 XJB 见面 N 次，所以 J 直言不讳地谈了对 XJB 为人以及作品的看法，并得到其余各位的认同。

谈话中还提到了 ZNE，但 B、W、L 并没有听说过她。D 说 ZNE 和 SY 是一个路子，而 YRX 是另一个路子，如果两个路子能结合起来最好。D 和 J 都对 ZNE 的过早去世表示惋惜，D 甚至想发掘 ZNE 身后的资料，但 J 听说 GH 和 YKS 一本书的审稿费只有区区 200 美元后没

接这个话茬。

在谈论 ZNE 时，提到了叶那个“血雨腥风中交班”说法，J 说既然张玉凤和谢静宜都否认毛这个讲话的存在，叶伪造的成分很大。B 不同意 J 的看法，说那个说法有多个来源，证“实”不容易，证“伪”也不容易。D 说那个说法在新毛传出现的很含糊，说它含糊，一是没有毛谈话的具体时间和受众，只是说叶 1977 年 3 月讲的，二是叶这个人对历史搞笑的事情可不少，比如他竟然对历史学家拿出 1979 年的报纸作为那个“草地密电”的证据（众大笑）。D 还说 WNY 那本书提到“血雨腥风中交班”时说了两个时间，跨度很大，受众也不一致，而且这些所谓受众中的任何人，并没有出来讲过这件事。

谈话中还涉及到有没有漏网的海内外国史研究专家，提到了 GWQ，还提到了 WYQ，在座诸位都对 WYQ 的偏激表示了异议，D 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 WYQ 对 CXY 研究林的行为进行了专横跋扈的指责！

在谈到 CXY 时，J 赞扬了她对田家英的研究成果以及她的文笔，D 说 CXY 的专业素养非 ZNE 能比，大家顺便回忆了 WNY。Y 说田家英这个人远非公开宣传的那么好。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由于逼近“913”的不惑之年，因此“913”成了聚会的最后一个热门话题。

J 问是不是李作鹏将军的家人对其丧事活动很满意？L 答家人是很不满意。看起来 J 的道听途说显然有误！

鉴于邱会作和李作鹏的回忆录很快会出版，看过未刊稿的 D 和 W 均说有一些新材料问世，故此 D 提出可以搞些新课题来研究，以纪念“913 事件”40 周年。

J 说当年四人指令是“与”指令，还是“或”指令，对三叉戟的上天没有任何影响，毕竟这四人都是林彪的下级。至于三叉戟能离境，更非李作鹏能左右和控制，虽然吴法宪有建议在先，但老人家“天欲雨娘盼嫁随他去吧”的圣谕才是关键，要说纵敌实在轮不到那个瞎子将军。

D 表示可以用这个思路作文章。……

聚谈持续了六个多小时，与会者在愉快的气氛中互道珍重、依依惜别。

当时临近党国 60 大寿，我用黑话追记也是万般无奈，其中的“代码”都是著名国史研究人物姓名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如 WNY 指王年一，GH 指高华。

在 2009 年末，我在问候李宇锋的同时，表示“于我而言，今年的幸事之一就是认识了你。”他迅即回复：“多谢蒋兄好意！‘幸事’云云，言重了，确实不敢当！但愿彼此在对历史真相的探寻中不断有新收获！”

一个敢于担当的人

随着接触的加深，了解到李宇锋为国史研究的贡献远不止《往事》这样一本电子刊物，知道他还经常组织形式多样的同仁研讨会，探讨国史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比如，他和《记忆》主编吴迪在 2010 年 6 月共同组织了《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座谈会，2011 年 5 月共同组织了《邱会作回忆录》的座谈会。

组织这类聚会，除了要承担经济方面的费用，比如材料复印费、邮寄费、与会人员的餐费，当然还有场地费，更要承担众所周知的政治风险，就我所知，李宇锋既承担了经济费用，也主要承担了相应的政治风险，毕竟是他提供了聚会的场地，他为此任劳任怨。

此外，与会人员的背景不同，既有体制内的专业国史研究人员，也有来自海外的学者，还有众多业余的独立研究人士，这其中有的是历史事件的受益者或后人，有的是历史事件的受害者或后人，再加上名利方面的冲突，大家聚在一起，就难免出现观点的尖锐对立，甚至意气用事。作为地主和主持人，李宇锋能很好地把“意气用事”引导到学术探讨和史实辨析的路数上，尽可能避免在座谈会这种学术公器上卷入姑嫂勃谿、兄弟阋墙的是非之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复杂的历史过程的观察和感受，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不敢只采一家之言”，“力持兼收并蓄之态度，以垂自由探讨之风范。”（《往事》，

1期)

我觉得，李宇锋还是一个出色的会议主持人，能很好地调控会议的气氛和进度。2011年8月24日，为了纪念“九一三事件”发生40周年，李宇锋和吴迪共同发起了一个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我报告了论文《回望“九一三”》。会前李宇锋申明：“报告人30分钟，评论人20分钟，自由提问与报告人回应上下午各安排40分。请自觉遵守，勿以主持人提醒、打断、禁止为忤。”那天，我话多了些，甚至有抢话之嫌，结果多次被李宇锋理所当然地打断，并非常策略地引导到与他人的互动之中，使得会议的气氛热烈而友好。次日，我由衷地向李宇锋表示：“昨天参会互动，收获甚大。李兄和吴老师辛苦了！”李宇锋迅即回复：“感谢光临，使李某得一睹蒋兄滔滔雄辩神采！”我随后打趣他：“哪里，哪里，昨天未尽兴：李兄不断地鸣金，俺只能无奈收兵。”

一个善于倾听的人

《往事》的发刊词上说：“《往事》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时也关注此间的中国社会，倾听被边缘化的声音和大多数沉默者的述说”（《往事》，1期）。

就我所知，李宇锋做过很多访谈，而且我感觉，他本人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2012年5月14日，我接到吴迪的通知，《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一书，请到李宇锋处去拿。此前，吴迪告诉过我，由于“《记忆》没有经费，全靠一二友人捐款和主办者自掏腰包，这其中快递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要对捐款人负责，节省每一分钱。因此国外和北京的都不快递，请其到李宇锋处自取。”我猜想李宇锋就是吴迪所说的捐款的友人（之一）。

于是，我在5月15日下午就去了李宇锋家，不巧的是，书尚未送到李家。不过，在李家碰到了郑仲兵先生，我们在一起除了闲聊文革旧事之外，还聊了一会儿刚发生的薄熙来事件，包括薄在重庆的作为和人望，也算是不虚此行吧。

5月16日晚，李宇锋告诉我，书已到，你明天来拿吧。

于是，我5月17日下午再次去了李宇锋家。那天他家里没有其他客人，也就有了我和他的唯一一次对聊。因为《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这本书既收录了他的《“林副主席是坏的”——“九一三”的童年记忆》，也收录了我的《林彪卷入“两谋”有多深？》，所以话题就从闲聊林彪开始，随后将林彪与其他中共领袖进行了对比，特别是和彭德怀进行了对比：两人都是敢言之人，都是倔强之人，都在会理会议前开罪过毛，都和高岗站在一起过，都是在庐山上倒的霉，但两人也有许多不同，如刘少奇评价彭不如林勇敢，毛泽东评价彭不如林孤僻……。另外，林在1959年批彭时虽然称毛是大英雄，但把彭与自己是并列的，1966年仍然肯定彭在八路军中起着主要作用，1970年下庐山时声称大不了就做“彭德怀第二”；“九一三”后，毛泽东认为在遵义会议后林彪伙同彭德怀要夺他的权，虽然林对此在1959年就有过“庄严申明”，而彭德怀在被逼之下则说过“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

在对聊过程中，我发觉李宇锋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善于从闲聊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当我说到彭雪枫在评论毛泽东与彭德怀、林彪的关系时，曾经将毛泽东比作水泊梁山上的宋江、彭德怀比作林冲、林彪比作花荣，李宇锋问我从哪儿听说的，我说是张爱萍的儿子在《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披露的。

当我说到，众所周知，彭德怀24年中被毛泽东四次提及会理会议，而林彪36年中得有六次被毛泽东提及会理会议就鲜为人知了，林肯定为此不胜其烦，还向人抱怨过毛的“耿耿于怀”，李宇锋马上追问出处所在。

当我说到虽然林彪后来成了叛徒卖国贼，对毛伤害很大，但暮年的毛依然认为林是他手下第一大将，李宇锋问我听谁说的，我说是张聂尔，张聂尔则是听毛远新说的，李宇锋说他听李延明说过类似的话，李延明也是听毛远新说的，而且毛给四大军队统帅的排名是林粟彭刘。

当我说到抗美援朝时，由于仗没打好，40军有个副师长说了句“彭总不如林总指挥得

好”被传到志愿军总部，结果总部要下来人调查……，按说 50 多年过去了，现在彭德怀的名声比林彪好多了，可当事人现在还是讲军人对统帅的崇拜是有历史渊源的，也是军队打胜仗的重要因素，因为我们长期在林彪的指挥下，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所以对林彪的指挥十分佩服。这个当事人还讲，实际上彭总对来朝鲜是有情绪的，他讲过，我就是奉命来的，可有的人还不来呢。李宇锋听我讲完这些事，也马上询问信息来源。

当李宇锋对我感叹彭德怀在知道林彪死后要求打电话给总理并表示这样把林彪杀了他有意见时，我说彭德怀一开始以为林彪关在其隔壁，还问过看管他的卫兵，有一次半夜，彭还一边拍墙，一边大叫“林彪，林彪！”，肯定是有话想说，李宇锋说他俩这时见面会说什么呢？李还问我这是听谁说的，我说是 2007 年欧阳龙门来北京给我当面讲的，记得他说他有个亲友在彭德怀专案组干过，但我也记不大清了，也许是他那个亲友参与过彭德怀传记或者年谱的写作，看过彭德怀的监管记录吧。李宇锋问的很细，随后认真地说，看以后能不能找个机会对当年看管过彭德怀的人做个访谈，核实一下欧阳龙门讲的这段是否真的。受到李宇锋较真劲儿的启发，我说如果你真能凿实的话，以后可以整一篇《从会理会议到庐山会议——林彪与彭德怀比较研究》，就用“‘林彪，林彪！’，彭德怀一边大叫着，一边拍着墙”作为其开头……

一个意志坚强的人

自打我认识李宇锋起，他就坐在轮椅上，可以看出来他有时很疲倦，不时会有人给他换下腿，但他至少看起来很乐观，也不愿意与人多谈这个话题，可以说他是个不怕病魔、不怕挫折的人，他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是凭着他坚强的意志来抵御了。

因为我知道李宇锋愿意做访谈，所以有一次我告诉他，有几个一起办党史军史论坛的朋友聚会，其中有“九一三”发生时的空军副司令员的女儿、空军情报部长的儿子，还有一个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如果方便的话，欢迎他出席。李宇锋很快回复：“多谢蒋

兄招呼！真遗憾，我在山东呢！还没下地，2平方米的床卧了3个月了，耽误多少事啊！”

尽管这样，他依然将《往事》坚持办了下来。刘家驹先生是李宇锋的忘年交，有一次在刘家，我听刘老感慨地说，李宇锋身体看起来不行了，《往事》也难以正常发行了，真让人担心啊。

李宇锋曾经说过：“恰恰由于现实困境的压迫，使很多人选择了可以理解的生存方式，我们才格外敬重那些坚守青春理想的人们。”（《往事》105期）他除了面临现实的压迫，更得忍受病痛的折磨，如果不是有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强的意志，很难把存史这件事做下来。

我最后一次联系李宇锋，是为了确定“千秋”的文章，《倾听历史的声音——评林彪事件》，登在《往事》的哪一期上？还想了解一下“千秋”的背景。我对他说，我在写《林彪与抗美援朝的那些事》，李宇锋告诉了我有关信息，还鼓励了我几句……

万万没想到，再听到他的消息却是一个他已经和朋友们永别了的噩耗！

在悲痛之余，我觉得，李宇锋的去世无疑对中国的民间现代史学研究是个重大打击，想想他提供场地并主持的多次研讨会，再考虑一下目前的现实环境，短期内很难再出现一个像他那样既有胆有识，也有人脉和财力，更有奉献精神的人了……

呜呼哀哉！■

【文衡同仁】

夜航传灯有斯人

韩 钢 王海光

听到宇锋去世的消息，我们惊愕之至，实在不敢相信。迅即打电话给阎长贵先生，得到了证实。一时之间，与宇锋交往的种种景象，一下子涌到眼前，心绪久久难平。

我们与宇锋认识，算来也有十多年了。2004年夏，郑仲兵先生约雷颐、李郁、韩钢讲

讲文革史研究的动态。当时郑先生与一位叫李宇锋的年轻人开办了一家文化中心，叫文衡文化发展中心，专门做有关中共历史、中国当代史研究方面的事情。做文化中心的人很多，但专门做有关党史、国史研究的还真不多见。韩钢从此认识了宇锋。来年春，宇锋又约韩钢到文衡中心讲党史研究的动态。韩钢讲了两个半天，介绍了20个党史

研究中的难点热点问题。韩钢还介绍海光认识了宇锋，郑先生和宇锋专门约海光也去文衡中心，讲关于中共党史和文革史的研究状况。

宇锋是位残疾人，坐着轮椅，从山东来的，大概有些资金，来北京与郑先生一起开办这家文化中心，做党史、国史方面的口述访谈，抢救活资料，创办电子刊物《往事》。残疾人不在家里休养，却到北京办文化中心，还不考虑赚钱，做赔钱“买卖”，这让我们由衷地感佩，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是文衡中心《往事》刊名的肩题，出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虞美人》。词句道出了对世事的变迁，也折射了往事的丰富和驳杂。众所周知，中共历史、中国当代史距今天最近，却最为复杂，档案开放度低，政治敏感度高。做这方面的研究，是一件耗费心力，又会麻烦缠身的事情，非一般人愿为。宇锋并非专业出身，又是残疾人，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来做这种费钱费力自找麻烦的事情，为学界和社会保存一份历史记忆，这是一种大情怀、大担当。往来多了，我们对宇锋的文化情怀和责任担当更有体会，交情日深。只要是宇锋有招呼，我们差不多都是要去的。

宇锋是一个谦虚好学的人，有很强的文化理解力。我们虽然比他年长，又是专业出身的，但与宇锋的交流，没有任何专业障碍。在许多问题上，还有不少增益。这些年他积累起愈来愈丰富的专业知识，形成了他对历史的基本理念和看法。中共历史、中国当代史的

研究有大量成果，宇锋在尊重前人的同时，并不囿于成说，常有追问和挖掘，显出历史研究者的严肃和审慎。海光解读一份文革传单《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的文章，是给宇锋在《往事》第35期上首发的。他与宇锋曾一起讨论过对这份文革传单的看法，对传单的作者身份，传单的反文革保守派观点做过探讨。韩钢在“文衡”中心介绍党史研究的难点和热点，宇锋嘱人做了录音。他将录音记录稿送韩钢整理，就其中的一些问题透过电子邮件同韩钢讨论。“热点难点”改成“难点热点”这样的细节就是他建议的，他说先有“难点”，然后才会成为“热点”。韩钢的这篇发言整理后发表在了《往事》上，一时成了网上最热门的帖子。我们认为，在文革史研究的各种电子刊物中，《往事》的编辑水平是最好的，史观和史感都是第一流的。我们最喜欢读的是每一期《往事》的“编者的话”，它实际上是所刊文章的导读，言简意赅的总结归纳，鞭辟入里的理路分析，对正文的叙述做了很好的提升。

宇锋待人诚恳实在，性格豪爽，有侠气，是一个很透明的人，有很强的亲和力。他的文衡发展中心，是传承和研究党史、国史的一个民间学术重镇，为北京民间史学者、爱好者的一个聚会场所。在这里，确实是“往来无白丁”，既有文革史的研究者，也有文革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大家一起交流看法，回忆过去，纵论历史，月旦人物，有一种君子之交的其乐融融。这种随意性，是在其他场合很难有的。我们在这里，见到了许多历史的当事人。有林彪事件的当事人及其亲属，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有文革中坐牢的“现行反革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普通民众。对研究者来讲，这种交流是很有收获的。这些历史亲历者的范围很广，许多回忆非常有价值。其中有的当事人回忆已经出版，成为文革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存史工作。

许多小型民间文革讨论会，都是在“文衡”召开的。如北京文革史学者关于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的《毛最后的革命》的民间讨论会，就是李宇锋的“文衡”出面组织的。文革史讨论会的组织，并不是拉场子那么容易，是有许多对立观点交锋的。宇锋对不同观点的朋友，都是抱有“和而不同”的善意态度。

有一次，“文衡”开了一个有关“九·一三”事件的小讨论会。有一位与会者的文章，有些史料上和理解上的硬伤，海光当场指了出来。这位朋友在会上没有反驳，会后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攻击性的文字。宇锋立即给他打了电话，请他撤了下来。过后很长时间，海光才知道有这件事情。宇锋的胸襟和学识，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聚集起了一批朋友。可以说，在京城文革史研究的小圈子中，哪有谁人不识君。在我们的朋友圈中，大家都把宇锋当作可以交流肺腑之言的老朋友。

当然，搞文革史研究，在现有体制下是一件犯禁的事情，来自有关方面的“光顾”自然也是少不了的。他们不理解，也理解不了，一个文化中心，为什么只是做赔钱的“生意”。他们更不理解，真实的历史和历史记忆对一个民族文化传承有何等重要。所以，有关方面经常登门“拜访”，甚至一度查封“文衡”。宇锋非常坦然，勇敢地据理力争，争取应有的权利。在他残疾的身体中，有着自尊自强的傲骨，有着庄严自重的灵魂。这是一个让那些四肢健全的精神残疾人羞愧难当的真汉子。

我们与宇锋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旧历新年前他刚从山东老家回京后。问及他的身体，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不太好，神态自若，镇定从容，不见任何紧张和纠结。我们认为是小恙，无碍大体，还约好今年春节再聚。谁知天不假人，让他在53岁的壮年时就走了。

当前在中国大陆的文革史研究，犹如在茫茫大海中的夜航，在黑暗无际中，只有天边微弱的星光，提醒着人们不能遗忘的方向。在文革史研究的路途上，这些若隐若现的星光，就是记忆历史的文化传灯人。宇锋就是这样的传灯人。他虽然只有53岁的肉体生命，但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他创办的《往事》，却赋予了他永恒的精神生命，留在了文革学术史的篇章中。他的睿智理性而积极热情的生活精神，也将会在他生前的朋友们中继续下去。■

2017-2-24

于上海

【文衡同仁】

身坐轮椅，胸怀天南地北（诗一首）

刘若



身坐轮椅，
胸怀天南地北。
博览中外古今，
倾听当下众人经历，
思考未来风雨。

前天，今天，明天，
一篇篇，一件件。

回忆，交流，畅谈，
《往事》扛起重担。
记忆永不消退，
昨天就在眼前。

《往事》134期
绝不是终点。
协手再写续篇，
宇锋要看！■

【文衡同仁】

何须向死而生

——宇锋琐记

戴为伟



什么时候认识宇锋的，我记不清了。真正对他有印象，是他来寒舍给先父做访谈那阵儿。那还是用磁带录像机的年代，一盘盘索尼磁带（有一般磁带1/4大小）放在桌上，摄像师过两个小时就更换一个。宇锋和仲兵（郑仲兵）叔叔坐在爸爸对面，偶尔提些问题，然后就是听父亲侃侃而谈。那时的宇锋，长一些的路要坐轮椅；在四合院，从南屋到北屋串个门，自己一只腋下架着拐也能蹒跚走一段，但看起来很吃力。2004年前后，宇锋的文衡文化中心正干得起劲儿，文员、摄像、司机，一应俱全。逐渐每次七八、十几人不等的学术讨论也颇能汇聚一些现代史学者和历史见证人。宇锋曾一口气和一些名人签开独家访谈合约。这些人都大起大落经历过中共建政的头三十年。用王思彤（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的公子）的话，宇锋这是在搞文化产业。把不招人待见还过分敏感的现代史当产业，怎么个赚钱法儿？宇锋不断与人签合同，这之中投入过多少，能不能回本儿？与他相熟的老人们，包括我爸都为他捏把汗。

思彤在文衡做摄像录音师，间或会抱怨自己薪水低。

宇锋的正业是与几个哥们儿经营一家耐火材料厂。那是国家投入4万亿刺激经济前后，这个企业红火了好些年。自打文衡起来，没见宇锋打理过这个厂。几个哥们支持他搞文化。文衡办公就在宇锋北辰亚运村的单元楼里。这里既是工作室又是会议室；即是宇锋的家，又是思彤们的宿舍。我复印父亲一些陈旧稿件，时到宇锋那儿去“揩油”。提着五十年代的旧报纸、旧稿件去街头复印，复印作坊里的伙计小心翻看着已经发黄变脆的纸张，

时常皱眉拒绝。这时，只有宇锋会在电话那头儿稀松平常地解我愁颜：“不麻烦，来印吧。”宇锋的豪爽是出名的，那么多年，逢在文衡办会，中午大多是他破费请各位学者名流聚餐；逢年过节，他会约上十几知近老小，连同小刘、思彤等，像模像样地一起下馆子高兴。

那时候，宇锋工作室人来人往。文员小刘麻利严谨，二三十万字的访谈，过不些日子就能拿出初稿请口述者修改；摄像思彤想法活分，除了完成日常采访，还时常受邀外去积累点素材或赚些外快；司机小宋更是忙得不亦乐乎，送往迎来都是他的事。工作室书柜里各种外面见不到的书、资料整齐有序。那真是文衡火热的年代。

不记得是哪一天，大清早一睁眼，接到思彤情急火燎的电话：“昨天夜里，文衡被抄，宇锋和宿舍的几个人都被带走了……”恰巧这夜思彤没在宿舍休息，否则我们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个急人的恶信。来不及想，我急速把消息告诉爸爸，告诉关心宇锋的朋友们。我们认识的，都是读书爬格子的朋友，谁——，能有办法呢？！

宇锋父亲李晔先生，在康世恩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期，担任胜利油田领导。宇锋多亏了自己父亲，中午时分，他拖着残障的身子，被放回来了。

电话里，宇锋依旧笑呵呵的京腔儿：“告诉你家老爷子，别着急，都解决了，解决了。”听着这话，我好像看到电话那头，宇锋又点起一根细长的坤烟，微微昂着点儿下巴颏，笑着吐出个烟圈。他不讳言自己受到惊吓：“好么，那一—，大半夜的，把我们一个个薅起来，当时真都蒙了，都差点儿尿了裤子。不知道招谁惹谁了……”

其实，宇锋还真是招惹人家了。距今约十年，文衡送给一些朋友上下两册复印书《十二个春秋》（邓力群此书当时还未在香港出版）。不知怎的，一套加盖文衡章印的书，莫名流落到有司手里……一场惊吓，大概算是价码最便宜的处罚。半夜被警局抓去讯问，宇锋只好问什么答什么，还能怎样呢？不就是复印了几份手稿（书）？什么罪过？多大罪过！

这事儿没能绊住宇锋，文衡还是不定期地出她的《往事》。粗略想来，这可能是公元两千年后大陆第一家民办现代史期刊了。

把家和工作室裹在一起，宇锋的文衡多了些学生宿舍的杂乱。在没有微信，QQ也不甚

活跃的年份，每次去文衡，都能看到宇锋很不灵便的手指头缓慢笨拙地在电脑键盘上移动，收发邮件。从北大中文系毕业不几年，宇锋不幸患上一种奇怪的病，多发性神经纤维瘤。延宕很多年，不得已手术，落下行动不便的后患。这个病无法根治，那个散漫的怪物还会在他体内生长，出没诡异。

除了重要的口述访谈，工作室事务性工作，宇锋只能大撒把。渐渐的，耐火材料厂经营不景气，摄像比以前更爱抱怨薪水少……思彤终于离开文衡，悄悄带走很多重要的采访录像资料。再有学术交流时，没了摄像的宇锋会默默地在大会议桌上放一只小巧的录音笔。

宇锋很亲近那些因采访结缘的老人。每次我爸爸生病住院，只要他知道，总会从城北头赶到南城的宣武医院和老人调侃热闹一会儿。不为别的，只是一种心的默契和交流。

春节前后，是北京的社交季，这时宇锋会招呼阎老（阎长贵）、王老（王广宇），还有那些文革期间著名人物（毛泽东、江青等）的老服务人员们聚会一次，这好像已经成了他的惯例。就是戚本禹来京探亲，也几次到文衡来坐坐。约聂元梓访谈，和徐晓等为王晶垚（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丈夫）撰述回忆等等，更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我有时会禁不住好奇，问宇锋些无聊的事：“遇着那号话不投机，又无限热爱伟大领袖的，要你……”宇锋知道我要说什么，一脸坦然：“嗨，别想那些，低头吃菜，实在不成，就认真听着。其实这都无所谓，关键是人家愿意掏心窝子说给你……”说着，他还做出一脸天真、认真听讲的可笑表情。

2013年新年，一次和阎老去看王老，临出门时，缓缓落在我身后的两位老人突然停下，头挨头挤着嘀咕起来，耳聋的王老声音越来越大：“我说你这个人呀，这不行，还是我来吧，——”，阎老：“这次我先来，明年你再——”。看着我疑惑的样子，阎老说，他们都知道文衡那里比较困难，今年坚决不能再让宇锋破费。两位老人想接续着把聚会办下去。爸爸听到宇锋吃紧也很着急，希望能帮帮他。逢到这时，宇锋总是笑着：“老爷子，我好着呢，您不用操心”，然后马上岔开话头，接上些老人高兴听的事。

文衡有个房间铺着一张双人床大小的练功床垫，逢熟人去，通常会直接进这屋。宇锋

躺在垫子上，边做些康复动作边说话。他告诉我，在轮椅上做时间长了，腰会特痛，这样放松着感觉好些。这是认识宇锋多年来，唯一听到他说疼。

渐渐的，他身体还是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险象。从2013年秋冬，不断有宇锋被急救车拉去医院的消息，尽管我们再见到他时，他还是一脸“无辜”的表情，嘴里总是说着“没事没事”。但终究关心他的朋友们还是陷入极度不安。邵燕祥先生老伴谢文秀阿姨几次急的差我去劝宇锋，放弃疗效缓慢的中医，重视起现实状况：“这隔三差五就叫救护车谁受得了啊，一定要重视起来。这样下去不成。可心（张思之律师的徒弟傅可心）那里我也说了，你们一定尽快劝他，不能耽误。”可宇锋很主观的神态，每次提到病，他都会四两拨千斤，两句话就给化开。以宇锋的睿智，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病情缓急。

总坐在轮椅上，身体不能活动，宇锋越来越胖。一年多前，接他来“记忆”工作室，宇锋已经不能自己下轮椅上台阶。启之老师找来两条很粗的旧门框木条，来回挪着，他被一路推进屋里后就这么一直坐着，不时需要别人帮助挪动一下不舒服的腿。

去年夏秋，微信上传出思彤脑出血，躺在医院，医药费无着的消息。已经无法维持文衡支出的宇锋知道后，拿出一万元给了思彤妹妹……。此事宇锋并未对外人道。2016年9月底我去看他，无意中提到，他才讲给我。

去年早春，我八十九岁的父亲走了。在八宝山殡仪馆告别之后，人们都散去。待近正午，我捧着父亲骨灰盒上车后，才发现不远处，宇锋正坐在寒风中的轮椅上，眼圈红红的，向泪流满面的我们缓慢地挥手……

仅仅十个月，53岁的宇锋也走了。他抛下沉疴如山的病痛和心爱的《往事》，头也不回地追随他喜欢的老人们去了。一位朋友在微信上说：“这些年经历了几个老先生的死，今天又是宇锋，我们必须看轻生死了。” ■

2017年元月10日

【文衡同仁】

一点回想

——我与宇锋

徐海亮

2016走到年末，忽闻宇锋仙逝噩耗，顿时不知说什么为好……



2005年，阎长贵告诉我北京有一文衡，集聚一些老文化人，阅读国史、党史，采访方家，自然也研读文革史，这样我得以结识了《往事》——好像算当时北京最早的记载文革历史的电子刊物，也就结识了李宇锋，以及文衡压台者郑仲兵先生。

宇锋虽靠轮椅，行动不便，但不失下海者的豪爽，与文人的幽默感。我印象最深的是，宇锋对文革故事，大路文存之外的秘闻要事，总是听的津津有味，提出关键问题。他托我在港中文大学买回文革文库光盘。他对林彪问题特有兴趣，我们交往密切的，除了有些在文衡的座谈，交流一些新书外，可能就是联络研讨《吴法宪回忆录》了。吴书出版后，陆续有一些传到北京少数人手里，宇锋先也复印了一些以满足更多需要；这可能是原政治局委员，第一次出版的涉及文革的回忆录，人们无不先睹为快。

读了书就会发议论，两人或三人议论还不过瘾，就商议了多找些人座谈。由我出面请来邱路光和纪坡民等等经过那个时代较熟悉林彪问题的同龄人，李与郑找来阎长贵、刘家驹等人。宇锋安排大家在胜利饭店聚谈茶叙。第一次是2007年12月29日。吴家的子女没有在场（吴新潮在山东，吴金秋没有回国），黄春光没有去请（不希望涉林问题的子弟太多），李冰天在河南挂职未请。这是我第一次和一群人座谈林彪问题和涉林的一本回忆。宇锋作为东道茶主，言语极少，安详倾听，只是过半小时多需要换换架在膝盖上的另条腿。

这次座谈的录音好像文衡已整理出来，但未刊发。座谈中，有未与会者打来电话询问情况（黄春光就数次电邱路光，我想他是很想说些问题的）。没想到，座谈后连续有人来电话继续议论，还询问某某是谁，某某又是谁……

谈罢，宇锋很感到意犹未尽，我们觉得坐下来学术性地谈论吴书，也谈不上什么敏感事儿，决意再座谈一次。我联系了吴金秋，趁她回国省亲，在2008年1月5日，又举办一次。这次扩大了座谈范围，吴新潮正好在京，是宇锋派的车，我们去机场接回金秋；黄春光参加聚谈。研究者和亲属这边仍由我通知，纪坡民、陈东林和杜蒲（社科院当代所）等人参加，李延明（社科院马列所）、原当代所的刘志男（邓力群秘书）早就采访过邱会作等人，也参加了座谈。余汝信未到。宇锋则邀请了更多些的文衡活动者。入住的海鲜宾馆请宇锋选定，不过这次费用均未让他埋单，他为文史研究与传播已付出了很多。

这次的交流是很有价值的。记得黄春光对吴的一些言论、文字和行为提出过尖锐的批评，黄、吴、邱也就林案审理与纪坡民进行了交流。我在会后对吴书中一些有出入地方，给吴氏兄妹提出书面看法。李冰天从河南回来后，恰好研究军队文革的余汝信来京，就与黄、吴、邱一起谈了两次聚会情况。这次录音宇锋也做了整理，但未见公开。他亲自参加的多次采访录音，需要党史、国史研究的后继者整理的，太多了。

讨论吴法宪的回忆，是个良好的开端，后来宇锋还邀集海内外研究者座谈了《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与《邱会作回忆录》等，宇锋还叫我和黄吴李邱子弟在文衡议论这段特殊的历史，为李作鹏做辩护的张思之也参加过。要做的事太多了……

可惜李宇锋走得太急了。 ■

【文衡同仁】

宇锋兄，一路走好！

白 磊

2016年的最后一日，手机微信朋友圈内大家都在欢庆新年，各种祝福和祈望充满小小



的手机屏幕，突然看到戴煌先生公子戴为伟发出的信息，告知宇锋兄旧病复发，于12月30日猝然辞世！（实际上是31日）我虽然一直听说宇锋兄身体状况不太好，但也隐隐有一点希望，却未能想到这一天终究还是到来，惊讶之余，是无限的哀伤与悲凉，尤其是在这新旧交替、前途暗淡的岁月。

认识宇锋兄是2010年左右，之前几次赴京，虽然与他有过电话联系，但未登门拜访，直至那年我赴京参加“两会”工作，会议结束后去拜访《记忆》的主编之一、《内蒙文革实录》作者吴迪老师。吴迪老师在小西天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的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办公室接待的我，除了鼓励我要将陕西文革继续深入研究下去，还赠我两册《记忆精选》和一册《联动娃娃》，因为有关方面对出版物的严加管控，所以这两本书都是吴老师用母本复印装订，分赠给朋友的。下午吴老师顺路去《往事》，就开车载我同去，记得在上电梯时还遇到从电梯走出的郑仲兵先生。

宇锋兄当时在主编《往事》的网刊，办公地点在北四环附近的一个小区内，出了电梯，吴迪老师引我进入一套民居改成的办公室，宇锋兄因身体有病，坐在床上与我们对聊。吴迪老师介绍我是文革研究的后起之秀，宇锋兄十分客气，连连说要讨教一些详细的历史问题，我则面红耳赤，愧不敢当。吴老师因有事，聊了一会便离开，我则与宇锋兄吸烟闲聊，话题当然围绕着文革研究与当代史研究，对某个历史人物的看法及某部回忆录的细节真伪的判断。由于宇锋兄长久以来在做现当代史的研究整理及《往事》网刊的编辑，无论是人或事，还是读到的港台书和自印本，都胜我良多，而我却还腆着脸滔滔不绝地班门弄斧，

聊得久了，宇锋兄抱歉说因为身体不适，不能长久时间坐着，需要半躺在床上和我继续说话，我心疼他的身体，却又不愿意放弃这难得的请教机会，于是我们半坐半躺，一边抽烟一边继续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记得当时文衡中心有一间客厅，南北都有好些书架，摆放着各类港台书及自印本，谈累了我就去翻阅那些书，第一次见到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内部出版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就是在这里，而更多书是只听说未能读到的，宇锋兄看我如此垂涎这些书，慷慨的说书架上只要有复本的书，可以挑几册送给我，于是我挑选了《李慎之文集》上下册、徐景贤《十年一梦》、《王申酉文集》等几种书，宇锋兄请助理帮我登记后，几册书归入我囊中，这是第一次拜访宇锋兄时得到的极为难得的馈赠，读好书的欣喜让我维持了很久，直至今天，每翻阅这些书时，仍感激宇锋兄的慷慨相赠。

后来渐渐熟络起来，回到西安后经常与宇锋兄通电话，就某些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进行交流，宇锋兄也从他的信息渠道和资料掌握与我探讨，并希望我给《往事》写点东西，我自知当时自己的水平还未能驾驭历史文章，所幸在自己兴趣方便做些小的历史素材的收集整理。有一次与宇锋兄谈到陕西有一位老干部将胡耀邦任陕西省委书记期间的讲话、文件、检讨、书信都收集，整理成一部一千多页的书稿，我恰好也从某个渠道得到这部书稿的打印件，复印留存。宇锋兄希望我也能给他复印一套。这一年的三月我又被全国政协抽调去给“两会”帮忙，会议结束后，我带着复印的书稿去拜访宇锋兄，他一见到我就索要资料，说是要好好学习一番，我却误以为他要学习全国两会的简报文件，两人说岔了，鸡同鸭讲，宇锋兄一怔，醒悟过来后说看那些劳神的东西干嘛，我要看的是胡耀邦在陕西的资料！两人不禁相视而笑。

这次见面，宇锋兄赠我一直在寻找的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以及何蜀老师请他转赠的新书《亲历重庆大武斗》，我又挑了新印出的纪念朱厚泽先生的文集《厚泽在人间》，本来还看上一套《今天》的影印本，但那套书太重，未拿，后来再想找这套书时，宇锋兄抱歉，说书已被有关部门全部查封销毁，每念及此，甚是后悔。

几个月之后，宇锋兄通读过我送去的书稿，打电话来与我商量，想选摘一篇胡耀邦在陕西的讲话刊登在《往事》上，请我写一段推荐的文字，这就是后来刊登在《往事》第114期的《胡耀邦在陕西省委的一次讲话（1965年1月22日）》。宇锋兄在编辑这篇文章时写道：“本文是胡耀邦外放陕西主政时的一篇讲话。时值社教中期，毛刘关于运动性质之争在‘二十三条’里已经表面化，毛以‘两条路线斗争’、‘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否定了刘的‘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的判断，并开始纠刘之‘偏’。而陕西，恰是刘少奇掌控之西北局的辖地，胡耀邦的履新其实就是履险。”

自“桃园经验”以后，面向基层的四清运动日益严酷，西北局更是变本加厉，左风劲吹，百业萧条，人人自危。对这样的局面，胡耀邦既要有所作为，又不能全盘推翻，只好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得饶人处且饶人。不唯如此，还要时不时把毛的话祭出来助阵。

在当时的背景下，做到这些，已属不易。十几年来，执政者疲民殃民运动不断，苛是常态，宽是例外。四清从根本上说，是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整肃，无论目标向上还是向下，都是苛政。非但不能缓解，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胡耀邦没有扭转乾坤之力。

即便如此，陕西的干部群众依然感念胡耀邦——一个胸无城府、与人为善、体察民瘼、实事求是之人。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施行了善政，松绑减压，化解戾气，解放干部，与民休息，恢复生产……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捅了马蜂窝：“解放干部”不就是要翻案吗？你要是对的，那整人的人不就错了吗？进言之，四清不就错了吗？“与民休息”和阶级斗争背道而驰，“恢复生产”与“民主革命补课”也不相符。胡耀邦的所作所为，未得毛刘任何一方的“中央精神”，哪边都靠不上。更何况这是在别人的地盘上，怎么能容你这么横插一杠子？

结果是干一百天事，挨一百天整。直整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好在有人救驾，才捡回了一条命。对比后来那次“生活会”又是何其相似！

胡耀邦这次外放陕西，有人认为是功绩，有人认为是前科，这且不论，就说他这次陕西的“百日维新”和改革开放后的主持新政，倒是有线索可寻，且一以贯之的。至于两次的结果，要说是命，那也不是他个人的命，而是这个党的命，这个国家的命。

时至今日，似可认清四清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都已证明“左”的暴政的根子，并非只是认识上的“指导思想”，否则，只要“右”一点即可摆平。耀邦在四清中做了，而且在改革开放中做得更卓有成效，但最终都功亏一篑，连命都搭进去了。历史说明，“左”的根子在于体制。只有改制——铲除专制体制，建立宪政民主政治，才是沧桑正道。

虽然宇锋兄对胡耀邦主政陕西期间的史料所知不多，但他精准地分析出了胡耀邦在陕西挨整的关键所在，宇锋兄后来也同我谈到过，所谓四清时期陕西发生的胡耀邦与刘澜涛之争，其实就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之争，陕西的“刘胡斗争”其实就是文革在陕西的预演，不同的是胡耀邦并没有毛泽东的雄韬大略，而刘澜涛也比胡耀邦要诡谲的多，无论整肃的手段还是方法。所以注定了胡耀邦的悲剧性命运。后来我读到更多当年的史料，也从侧面印证了宇锋兄的这一判断。

与宇锋兄越来越熟悉，我戏称他为“李宇老”，而他也笑称我为“白公”，有什么好书他会请作者签名寄赠给我，而我也时常与他电话交流，谈一些新书及史料文章的细节问题。随着通信方式的发展，从电话到QQ，到后来的微信，科技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从2015年起，陆续听到一些师友说宇锋兄的病情在恶化，但我总希望这是误传，虽然不指望宇锋兄痊愈如初，但也希望他的病情不再发展，能维持现状我亦满足。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终不能阻止客观规律的变化发展，最终，宇锋兄还是离我们而去，去了那个没有病痛疾苦的世界。

宇锋兄，一路走好！■

2017年1月草就于西安

【文衡同仁】

宇锋，我对你说

刘进

2016年的最后一天，吴迪告诉我你昨晚突然走了，我不愿意相信，希望你能够像前几



次那样挺过来，但我明白这次你真的走了，去和天上的父母相聚。

2006年8月5日，你资助并主持了卞仲耘校长诞辰90周年、遇难40周年纪念会。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你的名字——李宇锋。在宜粗不宜细的大环境下，你召开了卞校长的纪念会，让我们感动而且很受鼓舞。之后，几个女附中老三届校友相聚时，叶维丽、于羚介绍了她俩参加卞校长纪念会的情况。她们说你是做历史的人，正派、可信、可谈，还说你认为一些事情必须由亲历者自己写出来，即便现在不可能出书，也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先把事实留下来，让后人评说。

这些看似平淡的话，实践起来绝非易事，而你就是那个话不多的实践者。多年来，为了还原历史、抢救记忆，你搭起了平台，广泛联络学者、朋友，提供各种条件支持调查研究、召开反思和追思研讨会。你创造的条件使许许多多文革亲历者有了讲述和留下记录的可能。2009年6月16日，我们女附中的“五人谈”（去了六人，其中刘沂伦的单独成篇）就是在于秀园的小会议室里完成的。

那次座谈会是你和冯敬兰促成并主持的，除了你还有郑仲兵、徐晓、田晓青和徐星参加，女附中的有冯敬兰、叶维丽、于羚、刘沂伦、宋彬彬和我。我们几个不同经历不同观点的人，从各自的角度回忆了女附中文革中的“八五事件”前后，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从上午一直说到下午。尤其难得的是宋彬彬第一次敞开心扉，公开讲述了自己文革初期的经历。最后，你和郑仲兵老师说的话让我感到久违的温暖。会后，我主动上前跟你说：“李

老师，请你告诉下面还需要做什么，我们一定配合。”你听后笑着说：“这件事不是我们来做，而是要咱们一齐来做，商量着一起做。”说话时，你还用手指了一下我和你自己的胸口。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连声说：“对！对！”我想，我是文革的亲历者，愧疚太多，而你那时年幼清清白白的，谈何“咱们”！我也明白，你是在给我说，作为中国人要一齐面对文革这场人类的劫难，咱们要一齐来面对，一齐来做。

会后不久，你就拿来了七八万字的录音稿，我们几人边整理边讨论，最后由冯敬兰综合汇总修改意见和整理文字。三个月后，五万余字的记录稿如期交给了你。

2010年4月底，网刊《记忆》第47期，女附中文革专辑（一），以《也谈卞仲耘之死》为题刊登了这次座谈的主要内容，网上称其为“五人谈”。同年8月，《炎黄春秋》第8期以《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为题，摘要发表了《记忆》刊登的这次访谈。

2010年11月2日，为了给《记忆》女附中文革专辑（三）组稿，主编吴迪和你在秀园再次召开会议，除了女附中老三届校友外，还有独立制片人胡杰和青年学者胡泊等与会。大家对专辑（三）的主旨以及上什么文章各抒己见，讨论中伴有争论。你一直默默地听着，只有几句轻声慢语的插话。你说：“发表‘五人谈’是往前走了一步，宋彬彬也在里面说了话，但这不是你的文章，你一定要自己写，而且要登出来。”胡杰最后还说专辑（三）一定要有高度。会后，你坚持要请我们到西贝吃饭，席间你聊兴甚浓，话说了不少，只有一句我没大明白：“我们不是圣贤，也别逼我们做小人。”大家担心你身体受不了，几次劝你回去都被拒绝，一直坐到下午三点才散。那天日记中，我写了一句“宇锋肯定累坏了”。

从“616座谈会”到这次文革专辑（三）的组稿会，其间多次听说你生病的消息。2009年下半年，你腓骨骨折，宋彬彬代表我俩给你发短信慰问，你回复说“多谢二位兄姐！伤不重，就是限制行动自由，误事不少。听冯老师说刘进已经把整理好的资料转给学校了，真是功德一件！便中烦请代致敬意！宇锋”看后我受宠若惊，有些承受不了，于是把你的短信转给敬兰，说“彬彬转来宇锋短信，诚恳而客气，又肯定再三。都是对历史负责才能走到一起，我是当事人理应承担。要谢得谢你和宇锋的促进，没有这众多支撑，不会有616

座谈！”敬兰的回复是句感叹“李是有修养有智慧的人啊！”

去年，敬兰约我一起给你送书。几年过去又有了见面的机会，让我高兴而期盼，早就准备好了带给你的书。8月1日，我和敬兰不约而同地背着书来到秀园，你和善地笑着和我们握手，高兴地翻看那些书，还问长问短的，然后无拘无束地聊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想到，这次竟成了我们最后的一面。

宇锋，虽然我们只见过这三次面，但从见第一次面后，我就把你看成最信任最知心的朋友了。在没有合适大环境的条件下，在把名利视为当然的今日，能有几人去做你这种选择并默默地支撑着，而且坚守到生命的终点？你用你的行动和通达，用你的病残之躯和年轻的生命，点燃了一个个像我这样的“咱们”，这就是希望。

宇锋，当年是六个女附中的老三届和你座谈，今天有许多老三届的学生在为你送行，她们说：

“非常悲痛在新年钟响之前突闻噩耗，不敢相信！你的音容笑貌犹在面前，你却突然悄悄地去了，让我来不及说一声谢谢，道一声再见！祝你一路走好……”

“太突然了。宇锋，你拖着病体，做着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敬佩你，你的精神不朽！”

“永远怀念宇锋！”

“……”

宇锋，放心吧，我们都记住了“咱们”两字，清楚了要大家一齐来面对一齐来做。■

2017年2月4日

【文衡同仁】

不可复制的历史人物

——宇锋二三事

吴 迪

宇锋比我小一轮，但是要在学校上论资排辈，他似乎应该算我的学兄——他从北大



毕业的时候，我才进这个学校的大门。他在国企独挡一面的时候，我还在季镇淮先生门下读线装书。他创办文衡的时候，我还徘徊歧路，为没有说话的地方发愁。如果不是办《记忆》我不会认识宇锋，不会知道北京还有一个“两头真”出没的秀园。而宇锋也不会知道天下还有我这么一个“个人主义者”，更不会跟我掏心掏肺，倾诉衷肠。

—

宇锋本来想走“团派”的路，现任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是他的学兄。胡春华79年入北大中文系，是前任团总支副书记；宇锋是81年入学，是后任团总支副书记。那时的他，少年得志，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北大校园里跑来跑去。他给自己设计的人生是，入仕途，做大事，进中枢，操国器，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这条路的头几步，他走得像模像样——在上学期间当上了团干部，毕业后到国企，几年后就当上了处长。据说，中国的事，都是处长们干的。宇锋这个处长，都干什么呢？他跟我交待：九十年代初，他在海南招商引资，每天就是迎来送往，机场——宾馆——娱乐场所，三点一线。主要任务就是陪着北京来的官员胡吃海塞，兼给各色老总找小姐。除了

不陪睡，别的全陪。

“不腐败，不堕落，行吗？腐败是推进器，堕落是润滑油，你要是拒腐蚀永不沾，立马出局！幸亏坐了轮椅，要不然，早晚也得进去！哈哈哈……”宇锋拍着拐杖的木柄，仰头大笑。那时候，他的手脚还能动，还可以架着双拐，一扭一扭地走动。他的手，还能用打火机点烟，不像后来那样绵软无力。

2013年3月19日那天是星期二，阴冷，下着小雪。我去看宇锋，说起他的病。他得的是“多发性神经纤维瘤”，二十万个人里才有一个。这种瘤呈线状，细长，在身体里乱长。先是在胸腔的纵隔膜上长，动手术割了；还长，又割了。胸腔没法发展，那纤维瘤就奔颈椎去了。颈椎是个很细的管道，那瘤子一长，就压迫中枢神经。于是又得动手术。宇锋跟医生开玩笑：我这手术可别像文革那样，七八年再来一次。宇锋有点后悔：“如果第二次手术不动就好了。胸腔多大呀，就让它长去呗，咱们肚里撑不了船，放几个纤维瘤还是可以的……”

从秀园出来，地上铺了一层雪。细碎的雪花静静地落在身上。路滑，我推着车，慢慢走。心想，命运真是诡异，如果宇锋不生病，他或许已经做了封疆大吏，我永远也不会认识他。他也不会读我那本正话反说的《中西风马牛》。

二

2003年8月，宇锋的文衡中心在秀园开张，前中宣部理论局的郑仲兵任董事长，他自任总经理。文秘、打字员、司机，编辑，加上志愿者，少时四位，多时六人。这个中心经营的是搜集当代史料，采访耆宿大老，主编民刊《往事》，为“两头真”和独立学者提供言说的平台，每年还要宴请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请他们讲述红墙往事。林彪旧部黄吴李邱的子女也常到文衡小聚，鉴别《邱会作回忆录》的真伪成了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案”也是他寻访的对象，王晶垚、徐晓、冯敬兰、刘进、宋彬彬在这里回顾往事，策划出书。海内闻达：李锐、何方、张思之、朱厚泽、钱理群、邵燕祥、王学泰、

阎长贵、王广宇、洪炉、刘家驹、何蜀、丁东、林蕴晖、雷颐、韩钢等等都是他的座上客。

大凡中心都以赚钱为业，而文衡则以赔钱为能。上面说的事，都是赔钱的买卖，别的不说，就是请来来往往的人吃饭，每年就要搭进上万元。

如果宇锋没灾没病，他大概不会走上这条路吧？就算是同流合污，也未必人人都能进监狱。他们这几届北大团干部，在“风波”之后，普遍下海，贪腐堕落，家常便饭。我认识的北大校友中，就有一位跟当年的宇锋一样，先在深圳迎来送往，后到北京做某传媒集团的副总。在深圳，我亲眼看见他把一个妓女带上了车，亲耳听到他的下属说他怎么收礼敛财。现如今，人家仍在上海掌管着一个不大不小的中心。

“李宇锋现象”只能在他坐了轮椅之后。问题是，坐了轮椅的高官之子，享乐人生者有之；搞中心赚钱者有之；搞慈善扬名者有之。像李宇锋这样，十几年如一日，以“刨祖坟”为己任，费力赔钱，不但没名没利，还要被国安“关照”，半夜三更，上门查抄。高官之后万千，唯坐轮椅的宇锋一人而已。

“吴兄过奖，吴兄过奖！在下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如果宇锋听了这话，大概又会眯起眼睛跟我要贫嘴。如果手指间不夹着烟卷，他可能还会向我拱手抱拳：“吴兄再往下说，我就成了‘身残志坚’的英模了。不过，上台领奖的事，还得劳烦吴兄。”

“领奖感言怎么说？”

“你就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人家李宇锋爱的就是这口儿。’”

“要是组委会颁你奖呢？”

“奖品就请组委会颁给那些喜欢熊掌、燕窝的主儿吧。”

出身高官的“红二代”，多是可爱又可憎的矛盾体。这种人中的大学老五届，中学老三届，曾经是马氏理想主义的主要载体；同时，又是毛氏专制主义的坚定信奉者。他们可以为消灭帝修反献身，又可以向“狗崽子”施威。他们既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作为、敢担当；又有同样强烈的等级观和优越感，居上位、贪权势。他们性格中多少都有一个“豪”字——说话办事气魄大、直爽痛快、敢想敢为、无拘无束。同时又事事占上风头，强势霸

道。在宇锋身上，这个“豪”字也隐约可见。但它多体现在前者。

三

康国雄老爷子也有一股豪气，经常在三里河他的公寓楼里举办各种会，邀请各路专家开讲，政情股市维权高考，举凡天下大事，没有他不关心的。人老了，皮肤松弛，眼睛变小，眼球浑浊。康老不同，眼睛大且亮，炯然有神。嗓音沙哑，但中气十足。他的令尊是当年陪都的金融大亨康心如，他小时候到蒋介石的府上玩过。文革中，被打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后来，他写回忆录，就以“蒋介石的干儿子”为书名。

有一回，他急如星火地把我召到三里河，说他要在香港办个出版中心，能不能请宇锋加盟？说起来有趣，他这个“黑二代”对宇锋这个“红二代”情有独钟，他是第一个提出，要“李宇锋现象”的人。

据我理解，康老把李宇锋称为“现象”，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宇锋的所作所为与众不同——一个省级高官的公子，办文衡，搞《往事》。其所为作，全是刨祖坟的勾当，这事还不稀罕吗？另是指宇锋很有点代表性——虽说在“红二代”里，宇锋是稀有品种，但是在思想文化界，宇锋却很有些同道。所以，秀园这个平台一搭起来，就车水马龙，高朋满座。大凡“非主流”人物，无论是离休的老干部，还是在职的专家教授，抑或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都愿意到秀园来。

所有的“现象”都不能凭空而来，宇锋能成为现象，源于思想的分化。按钱理群的说法，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事实上存在着两个中国、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一个是毛泽东领导的、占主流地位的中国，另一个则是尽管被镇压、被抹杀，却始终顽强存在的‘地下中国’；一条是在现实上实现的毛泽东的发展路线，另一条是与之相对立，尽管没有现实化，却存在着合理性的发展路线。而所谓‘毛泽东时代’就是两个中国、两条发展路线，相互博弈、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的过程”。（《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后记》）

我要补充的是，到了后毛时代，这两条路线的博弈更加激烈且日益公开化。文革结束，左派要捍卫毛，坚持道路制度理论；右派要改。那时候，左右两派的主力是三零四零后。“反自由化”一役，双方打了个平手。“风波”之后，左派势力大张，“毛粉”极左疯长。右派被清除。但经济一旦市场化，政治控制力就减弱，毛时代的思想一统，管理一元的格局不攻自溃。自由化虽在体制内难以存身，其思想散落民间，遂有各类经营文化的中心、中心、工作室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大部分经营文化者，走的都是影视音像之路。搞独立制片，拍摄违禁题材；到境外参展参赛获奖，或者与海内外电视台联手。真正以学术为基础的，如“天则经济研究所”这类公益性民营企业极少，而文衡就是这极少中的一个。与天则一样，文衡也是为社会无偿提供知识产品。与天则不同，天则搞的是经济；文衡搞的是当代史。经济是热门，最宽松。当代史是冷门，最严苛。

后毛时代，当代史是个交通枢纽，往左，它通向中国特色；往右，它通向普世宪政。谁占了这个枢纽，谁就有了引导国家向何处去的话语权。当代史由此成了左右必争之地，而文革则是这地方的桥头堡。自八十年代以来，这个桥头堡一直在主流的手里。争夺这个阵地的任务，天然地落在了独立学者手中，这些人散布在各个角落，无天时、无地利、无资金、无平台。唯一可以自豪的，就是装备精良。几十年来，纵八面受敌，仍仰攻不止。

这时候，文衡出现了，《往事》创刊了，宇锋举起了一杆旗，把这些散兵游勇聚到一起；宇锋撒下了一张网，将那些深藏在记忆中的陈年往事打捞出来；宇锋办了一个光荣榜，那些文革研究做了贡献的人们——周良宵、顾菊英等人榜上有名；更重要的是，宇锋撑起了一个平台，为那些“两头真”的老干部，为那些“主流”之外的边缘人，为那些被打成“黑二代”的前“红二代”提供发声的空间……。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重估历史。

四

在皇城根底下，举旗、撒网、搭平台，搞“非主流”，肯定会惹祸上身。文衡十年，

至少有两次幸蒙国保光顾。

第一次是在2006年，某晚有关方面请他来一趟，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宇锋吃罢晚饭，由家人推着来到了指定地点。一位官员告诉他，他们接到了可靠的情报，文衡藏有违禁之物，明天要去查封。宇锋表示一定配合。他估计，是中心自印的书出了问题。

第二天，十几名便衣光临秀园，先把所有的人赶进厨房，喝令他们面墙而立。然后分兵几路，搜查各个房间，而目标——几十套《邓立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就在眼前。“罪证”昭然，队长一声断喝，带走！便衣们将这些书搬上汽车，呼啸凯旋。

事后，我问宇锋：“关了你多长时间？”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就把你放了，够便宜你的！”

“人家一看见轮椅，就倒了胃口——藏有违禁物的，不能飞檐走壁，至少也是个腿脚灵便吧，谁知道是个甲等残废。关着我，不但得给吃给喝，还得派个专人护理，警力这么紧张，还是乘早放了吧。哈哈哈……”

查没了这些书后，文衡既没被封，也没被罚。其原因，坊间说法不一，一个版本说，时任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为文衡说了话。为什么周永康要关照文衡，因为他以前是宇锋老爸的下属。

另一个版本是，宇锋的老爸早就看不上周永康的溜须拍马，周逢年过节看望老首长，宇锋老爸都闭门不见。人家对文衡不罚不封，跟宇锋的父亲没一毛钱关系。只是因为宇锋的朋友认识里面的人。

前一个版本，让我想起了王力雄的一段逸事。那年，他到新疆搜集兵团资料，被国保盯上。没收了资料，人也进了监狱。审讯逼供，要他交出后台，力雄打碎眼镜镜片，割腕，以死相抗，未遂。力雄的老妈闻讯，给江泽民打电话痛诉悲情：我的丈夫文革被迫害致死，如今我的儿子又被你们关押……。于是，力雄被释放——原来力雄老爸当年是长春第一汽车车辆厂的党委书记，江从苏联留学归来，就在他的手下的动力处任职。

不管哪个版本，都让我想起了一句名言：在美国出了事找律师，在中国出了事找熟人。文衡第二次出事，是在2010年六四前夕。不知道为什么，国保把文衡看成了秘密窝点，一大早就派人在中心门口蹲守。以研究“九一三”著名的青年学者司马清扬，从加州回国，看望宇锋。一进门，被那国保逮个正着，问找谁？司马是个机灵鬼，一看不对头，马上改口说，他是来应聘的——文衡在网上招工。国保信以为真，司马走脱。

吴法宪的女儿金秋可没那么幸运，她比司马来得晚些，被国保盘问不止，她离开后，还有人尾随。吓得她跑到了天通苑，才给宇锋打电话问怎么回事。

宇锋说，他当时就在屋里坐着，看着国保的辛苦，很想给他们一杯水喝。

宇锋让我给他写个条幅，写什么？我想起了《呻吟语》中的“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

五

残疾人的共性是孤僻和自卑。宇锋是个例外。他一旦躺下，就必须有人扶助才能坐起来；坐着的时候，两条腿又得不断地调整姿势——把一条腿弯曲，把脚搭在另一条腿上。过一阵，再把这条腿放下，换上另一条腿。所以，他常年雇个护工。

我曾扶他从床上坐起，曾给他换过腿，但是，我一直不好问，为什么他的床没有床头，床上没有被褥枕头，只有一个光溜溜、硬梆梆的黑色皮革的垫子。我更不好问他，如果到时候不倒换腿脚，他的身体会怎么难受？

有一次，说起宇锋没病时，郑先生说：“当年可有不少女生追他呢！”

宇锋笑：“要是现在还有女生追，那才算本事呢。”为伟说宇锋淡定、优雅、从容。我觉得都不准确，但想起了听说小儿破贼仍在下棋时的谢安。

《记忆》跟文衡有几次合作。一次是《毛最后的革命》（麦克法考尔和沈迈克合著，香港、台湾都出了中译本）的研讨会。一次是纪念“九一三”四十周年。宇锋和我轮流主持会议。为了正规化，我置办了震铃，准备用它来掌握会议的时间。可真到了开会的时候，

这个武器对我一点也没有帮助——我拿不准是不是应该打断发言的人。碰到那些滔滔不绝的雄辩者，时间就无限的延长，而听众也木然从之。宇锋不用震铃，他有决断，有识见，把议题引向更有益的方向。

事后，与会者埋怨我，说人家宇锋比我会主持。我不服气，暗地里把我跟宇锋做了一个比较研究，我与他有三大不同：第一，我不是当领导的料，没组织才能。平生当过最大的官，上学时是小队长，下乡时是记工员，工厂时是小组长，没机会锻炼主持会议的能力。宇锋上学时主政系团总支，工作时是独挡一面的处长。就算不是天生的领导，后天也锻炼出来了。第二，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对组织、集体、纪律，从小就打心眼里烦。上小学，我“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老师说我是自由主义。中学大串联，学校都空了，就我没去。我平生最讨厌开会，不管什么会，只要能溜的一定溜，溜不成就在下面干别的。宇锋从小热爱集体、遵守纪律，是开会的专业户。第三，我喜欢讽刺，擅长给人家挑毛病。一有机会，还要出出洋相，说说俏皮话，逗逗哏。瑞典的汉学家沈迈克有意跟我来个双口相声，我还正经八百地写了个相声。当我从何方的书里知道，他年轻时也喜欢出洋相，顿时感到大欣慰。宇锋没有这些毛病嗜好，他虽然也诙谐，也调侃，但都是枪口对内，拿自己开涮。

我把上述研究成果讲给宇锋，并得出结论：“如果我跟你一个单位，你肯定是我的领导，而我肯定会给你捣乱；于是你就给我小鞋穿。文革一来，我就把你揪到台上批斗。”

宇锋拧眉做沉思状：“造反派是这样炼成的！”

我那时住的地方离宇锋不远，有时会骑车到秀园找他聊天。我问他《往事》选稿的标准，怎么在“地雷阵”里办刊——要知道，版署规定有十五个方面的选题必须报批呀！

“啊哈，《往事》是走钢丝，既要有新东西，又不能惹人家生气。咱们跟我党耳鬓厮磨这么多年，还不知道哪些事炝人家肺管子？我执行的是‘五不碰’：高层不碰，军队不碰，风波不碰，法轮不碰，民族不碰。”

杜导正给《炎黄春秋》立了个“八不碰”的规矩（六四，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法轮功，现任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民族问题，外交等），王鼎钧说台湾有个“三不碰”（不

碰军队，不碰特务，不碰第一家庭）。国共一奶双胞，英雄所见略同。不过台湾是过去完成式（五六十年代），大陆是现在进行时。足不能出户的宇锋早就不学自通。

2015年国庆，我们下了大决心，请宇锋到“记忆之家”来。“记忆之家”在一楼，楼外的大门前有四个台阶。我找了两个长木板搭在台阶上，为的是把宇锋和轮椅从板子上推上去。但是，轮椅一压上木板的下面的一头，上面的一头就会翘起来，几个人手忙脚乱，连推带抬，总算让宇锋进了屋。换别人，不知道得说多少感激的话，而宇锋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来，我得减减肥了。

承受他人的帮助，往往会感谢得过头。残疾人则会以过度的自尊掩饰深藏的自卑。这些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宇锋的淡定，让我想起了谢安的雅量——临喜临怒看涵养。没有大度量的人，在这时候，是沉不住气的。

“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荀子这句话，可以用在宇锋身上。

六

学术界也是红尘，“非主流”也是江湖，这里不是君子国，没有象牙塔，行走在边缘的人们也各有各的主义、政见和小算盘。人性的阴暗，人情的冷暖，名利欲、嫉妒心、地盘意识、山头主义、霸权思想，在独立学者、异见人士那里，一点也不比别处少。“水深江湖阔，无使蛟龙得”。宇锋没有遭到太多的嫉恨，端赖他的残疾——谁会跟一个高位截瘫的人论剑争雄呢？

但是，人心的冷漠，人情的刻薄，他是躲不开的——他为独立学人、民间人士提供平台，车接车送，请吃请喝，十年如一日。却少有人关心他的病情，少有人想到他的生计，更少有人关心他的精神世界。奔着平台，冲着会议，人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一旦文衡关张，平台消亡，马上门前冷落。是啊，大家都忙，没有人再想到秀园那个坐轮椅的人。

对于宇锋来说，这都不算什么——谁让你爱上这一口呢？真正让他伤心的，是利用他的善心诚意，欺负他的残疾，敲诈他，勒索他。

2014年秋，宇锋的中心关张。我去看他，宇锋像弥勒似地坐在床边，神情黯然。我问他，文衡为什么关了？他告诉我，他是耐火材料工程中心的股东，这十年一直是用他的股份支撑这个中心。文衡每年开支四五十万，十年花了四百多万。本来以为背靠大树好乘凉，没想到耐火材料不景气，“大树”倒了，他的股份也泡了汤。从年初到现在，文衡的开支全靠他的个人积蓄。为了开源节流，他辞了文秘、司机，把房子租出去。可还是入不敷出。只好把中心注销。

宇锋告诉我，王思彤把他这么多年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宝贵的音像资料席卷而去，手机不接，电话不回，发信不理，连他妹妹也不知道上哪儿找他去。

王思彤我见过多次，高高瘦瘦，不爱说话，一个安静温和的中年人。九十年代我去瑞典隆德大学做客座时，他老爸王若水跟我同行。我跟王思彤聊过这事，他只是安静地笑笑，没发表什么意见。他在文衡做专职摄像师，是中心的几个固定的员工之一。

“他为什么这么干？”

“还不是想要钱！”

“干吗不报警？”

“我不想给王若水丢人。”

宇锋说，王思彤没成家，爱招惹女性，所以老缺钱。在他这儿的时候，三天两头跟人家借钱，不但跟他借，还跟司机、秘书借，从来不还。据说，是结婚用，可女朋友换了好几拨，婚也没结成。

2015年国庆节，我邀请宇锋等十几位朋友来“记忆”小聚。北大老五届的刘淑君就是那时认识的。刘淑君后来告诉我，她曾经在文衡当过半年义工，王思彤雁过拔毛，跟她要了好多东西，还借了两万块钱，说是要买汽车。借了好久也不还，刘问他是不是不想还了。王诉了一大堆苦。刘淑君后来也不跟他要了——“直当我送给了王若水。”

2016年9月，宇锋要回东营，走前要见我。我手上有活儿，不想去。为伟说，宇锋找你一定有事。我去了。宇锋刮了胡子，显得年轻福态。他说东营有个康复中心，设备好，

服务也周到，他打算去调理调理。两周一个疗程，人家实行封闭式管理，没法上网，不能接电话。他打算做六个疗程。

说话间，宇锋指着墙角白布苫盖着的一堆东西，告诉我，王思彤卷走的音像资料回来了。我忙问怎么回事？

“唉，这是失之偶然，得之侥幸。前几天，王思彤在街上走，走着走着，突然摔倒，到医院一看，脑溢血，成了半个植物人。他妹妹是好人，赶紧通知我，让我把他赖着不还的东西取走。这不是，取回来了。”宇锋指着墙角，几块大白布盖着的一大堆东西。我和为伟连声感慨：王若水摊上了一个坏儿子，还有个好女儿！

“她正为她哥的医疗费犯愁呢！王思彤没参加医保，所有的钱都得自己掏。她妹妹哪有那么多钱，只好向朋友募捐。”

“他为什么不参加医保？”

“当初，他在文衡的时候，我一再劝他参加医保，中心给他出大头，他出小头。他连那点小钱也舍不得掏，你看，造孽了吧。他妹妹得到处磕头做揖，为他募捐。”

“你又捐了？”

“只捐了一万。不看别的，就冲她妹妹吧。”宇锋叹了一口气。

那天是9月22号星期四。宇锋从此永诀。

七

也就是在这个月，宇锋做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2016年9月11日至13日，他神不知鬼不觉地举办了“邵燕祥作品研讨会”，郑仲兵、钱理群、王学泰、章怡和等重量级人物参加。请看主持人宇锋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满满两天的精彩发言，鸿儒谈笑，不到三天的新朋老友聚会，共同切磋，彼此受益，意犹未尽，依依难舍！最后说一点多余的话。是我个人的感受。

在这日益逼仄的时空里，聚集这样一批当今中国的贤者、智者、好人，真不容易！这

不仅源于邵先生人格魅力和文章魅力的感召，更是各位理想不灭精神不死的证明！放眼望去，半室萧然白发，半室花甲青年，你们是何等优秀的一群！

钱先生谈坚守，章先生谈悲哀，邵先生戏称“提前开的追悼会”，请恕我不顾忌讳，联想到《茶馆》最后一幕，三位老人家那段戏——“咱们喊喊呢？喊喊？”这是时代的挽歌，也是时代的呐喊，你们是脊梁，是火把，是牌照！

二十七年前，游行期间，中国社科院大楼临街一面，一窗一大字，上书“你们正在写历史”。我想，这几天，我们就在写历史。在这危难而荒唐的时代，刺出一刀，点燃一灯！

章先生说“不能病，不能疯，不能垮”，这也是我们对各位前辈、老师的殷殷期待与祝福！

我们祈祷，将来有一天，我们发起“邵燕祥创作80周年研讨会”，大家都来，健康的来，快乐的来，幸福的来！

这算这一次的结束语，也是下一次的邀请函！

谢谢大家！恭候大家！



2016年9月11--13日，“邵燕祥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宇锋和与会者合影。

22日那天，他不无得意地跟我说：“就连最挑眼的章怡和，这回也很满意。”一个高

位截瘫，只能用一个手指敲电脑的人，赔钱费力，干出这等事业，其气魄、担当、本领如何？你会说，敢情了，他爸是副省长，有钱。不错，宇锋过去有点儿钱——在耐火材料厂有股份。问题是，有钱且身体健康的人多了，谁有这种境界？这份责任感？何况，在股份为零之后，宇锋不也照样在举旗、撒网、搭平台吗？

八

宇锋对死是有准备的。2013年3月的一天，刚吃完晚饭，他突然喘不上气来，脸憋成了青紫色。妻子胡伟情急之下，咬开速效救心的小瓶，在黄金三分钟把药塞到他的嘴里。在急救车上，宇锋醒了，向胡伟和女儿畅畅扮起了鬼脸。事后，我和胡伟到秦老胡同看他。

“一场虚惊，害得吴大人百忙之中，拨冗探视，以后小的再也不敢随便犯病了。”他笑呵呵的，像往常一样贫嘴寡舌。

“怎么回事，怪吓人的？”

“唉，那天我突然喘不上气来，就觉得憋得难受，后来就被人事不省了。原来看书上说‘气若游丝，命悬一线’这回可有了亲身体会。那难受劲，抵消了吸烟的全部好处。”

“有没有办法预防呢？”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现在就是听天由命了。”

那天是3月17日星期天，天气阴冷。我的心情像天气一样阴沉。从秦老胡同出来，我想起了前拐棒胡同，想起了徐晓笔下的赵一凡。今天的宇锋与四十年前的赵一凡何其相似！

他们都是身残志坚，都是“红二代”（赵一凡的父亲赵一平，25年入党，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第二号当权派。李宇锋的父亲李晔，49年入党，官至山东省副省长。）都立足民间社会，都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收集保存史料，都是“合理利己主义者”，不遗余力地为他人服务。

不同的是，赵一凡打交道的，多是年轻人，李宇锋打交道的，多比他年纪大。赵一凡是知青沙龙的主人，是“挖掘灵魂深处的启蒙者”；李宇锋是秀园会所的寓公，是“重写

历史”的组织者。钱理群说，赵一凡既反叛又归顺，是固执的理想主义者，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不可复制的历史人物。”（钱理群：《书信里的知青心路历程——读〈民间书信〉》载《记忆》178期。）李宇锋则是一个固执的民主主义者，是宪政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十几年来，他用双臂拖着僵硬之躯，一寸一寸，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移到历史人物的碑林之中。这些人物沉潜下僚，默默无闻；但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自古以来，国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精英之士得其一而足慰平生。宇锋残而弥坚，以身做则，是真正的“感动中国人物”。这是不是立德？宇锋赔钱四百万，访谈口述，钩稽索隐，重构历史。这是不是立功？宇锋主编《往事》十有余载，四册五卷，启人心智，这算不算立言？

如果宇锋九原重坐，又会笑呵呵地朝我拱手说：“折煞折煞。盖棺论定，我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个合理利己主义者。不让人恨就知足！”宇锋小我一轮，肚量比我大，对世道人心看得比我透彻。

文衡关张后，我跟宇锋有过长谈，他对门前冷落，别有一番解释：“物以稀为贵，非主流更吸引眼球，照样是媒体的座上客，照样当博导教授。没有文衡，人家一样活，可能活得更好。你别指望上封神榜，到忠义厅上排个什么座次。《往事》就是钻个空子，等到可以自由办报了，早没我的事了。那时候，能人多了，我这算什么，偃旗息鼓，歇了。”

毁誉对他来说，像雾像雨又像风。他不在乎后人的评价，他在乎的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

办了《记忆》之后，我认识了好多人，这些人的思想遭际，是两个中国博弈的实录，是主流与边缘关系的记载，是当代国史的重要组成。看到他们为官家所打压，为公媒所不容，为毛粉妖魔化。我遂发一宏誓大愿——尽我所能记下这些朋友。

王年一是第一个，刘向宏是第二个，宇锋竟成了第三。 ■

2017-2-27

北京之北

【文衡资料】

李宇锋写给王年的六封信

(2005-2006)

王老：您好！

《往事》迄今已有二十一期，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恳请您指点！

过一段，可能有朋友去拜访司马璐先生，我们希望能向他提一些问题。您对《司马璐回忆录》有何评价？书中有哪些事情没写清楚，或不准确？因为司马先生年事已高，又在境外，采访的机会不会太多，我们“外行看热闹”，怎样使这部有影响的书尽量少些遗珠之憾，希望您赐教！

祝您健康！问阿姨好！ ■

2005-8-26

王老：您好！

阎长贵老师转来了您建议举办专题文化沙龙的信件，郑仲兵老师和我们都很赞成。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限制，使我们在从事历史记录的工作时，经常感到视听闭塞，对境内外的研究现状十分隔膜，如果能建立这样一个平台，是非常有益的。郑老师希望了解您的具体设想，比如关于邀请人员、大致规模、活动周期、专题选择等等。

您对于《司马璐回忆录》的看法，我们一定转达。

祝您身体健康！ ■

王老：您好！

10月9日大札拜读，同意您的意见。我已经转告给韩钢、洪炉、阎长贵三位老师，他

们很愿意参加。舒云老师我不认识，已托阎老师转告，估计没有问题。

关于地点，我想安排在国防大学附近，找一间能谈话的宾馆（或招待所）房间，吃饭也方便（因为居住分散，路途需要时间，且深入交流至少得半天，工作便餐还是要安排）。

我有一个想法，请您考虑。按照以往座谈的经验，很多信息、见解，如果没有记录，很容易谈过便算，甚至谈过便忘，十分可惜。能否录音整理，发每人一份做研究参考？当然这样做要征得大家的同意，如果因此不能畅所欲言，那就作罢。

第一次交流的时间，请您定。我通知各位老师。

特别希望听到您对《十二个春秋》的见解。

郑仲兵老师感谢您的关心。他还有最后一期化疗，估计一周左右出院。田晓青问候您！

祝您健康！■

2005-10-28

王老：您好！

看到您写给《开放》的文章，感动复感慨：以您的学问、声望、年龄和身体状况，不仅勤于治学，而且勇于反思，确实使我景仰！这篇文章您如需要我们寄送，请告之。

最近，我和王友琴有通信来往，她对文革中的红卫兵暴行有专文论述并搜集了不少资料，愿意提供给您，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一些生动的小故事对研究、注释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甚至可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一般“正史”是不记载这些小故事的，流失了非常可惜。即便从阅读和流传的角度，也有大文章无法替代的长处。因此，恳请您在有精力的时候，写点故事（比如“到叶帅家看长征密电”）。或者请您口述，我们录音整理。我甚至奢望，有一天，大家讲述的故事可以汇集出版，那一定成为历史研究的珍贵参考书。（刚收到您的信，谢谢您的稿件。）

此致 祝您健康！■

2005-12-9

王老：您好！

今天上班，才收到1月24日大函，谢谢您为“茶话会”操劳！

节前我碰巧结识了印红标老师，他提到您，并表示愿意“琢磨个题目”。我给他发去《往事》各期，请他指教。您提到卜伟华先生大作《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一定十分精彩，不知道作者是否同意《往事》摘登？

听阎老师说，您关于“文革定义”的文章亦已杀青，更使人引领期盼！

“到叶帅家看电报”的档案如果真的“毁掉了”，就太可惜了！早闻“有司”有销毁档案的毛病，在我们局外人猜测，毁的总是些“传位诏书”、“要闻密奏”、“谋反宣言”之类要命的证据，而且偶一为之，尚得临渊履薄，冒天下之大不韪。“看电报”的档案有多大干碍？怎么竟如此大胆、荒唐、草率？照这般推测，那巍巍然的“国家档案馆”岂不是早就支离破碎了？很多历史真相岂不是也只能不了了之？

您说的对，“大家都讲话，事情就好办了”。

您对别人的作品，多加推崇，这是宽厚和谦逊使然，我十分敬重。但作为读者，我在您的作品中看到了更多的严谨、中肯、老辣，实有他人不可企及之处，您确实不必“深感自愧弗如”。对您的文章，不是不能商榷，但得拿出真材实料和真知灼见来，类似“碧水”一类，实在不值一哂。

我们给您老两口拜个晚年！

祝您新的一年身体好，成果多！■

2006年2月7日

王老：您好！

2月8日大札拜读。

我已和卜伟华老师联系过，并把《文衡简介》和《往事》第一期发去，以自我介绍并请他指教。大作《评<历史决议>中的文革定义》，舒云老师也传了我一稿，据说仍在修改

中，我想，这么好的题目，这样几位作者，如果精益求精，完全可以成为经典文章。

昨天和郑老师、田晓青商讨今年的工作安排，其中谈到文革座谈会和论文结集出版。我们考虑，是否应该对文革结束三十年来的研究状况，做一个大致的梳理？比如对文革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主要问题、重点阶段等，形成了什么样的成果？与“标准答案”或以往的结论有什么不同？简言之，给这三十年结帐，甚至给下一步研究出题。由此，论文集就有几种设想。

一种，拉题目，分析“标准答案”或各类“流行观点”。按时间或重大事件：文革的发动，五十天，批判资反路线，大串联，全面夺权，二月逆流，七二零事件-----；按人物：毛、林、周、江、刘、邓-----；按问题：文革定义，发动文革的原因，文革中的各种力量（两个司令部、军队、群众组织、工军宣队、革委会等），文革的后果，文革中的经济、文化、国防、体育、外交等，文革对世界的影响-----。这些题目，既可约专家写，也可从现有成果中选。也许不能面面俱到，但大致有个框架（或者脉络？）也可以成书。所提问题要准、精、巧，以上只是举例说明。

如果以分析“标准答案”为主，则比较集中，可以“多说”，深入分析。不仅要指明其“不然”，还要探讨其“所以不然”；如果以分析各类“流行观点”为主，则比较广泛，必须“多引”，点评要精当。

再一种，“乱炖”文革。题目不限，作者各展其长，只要有言之成理的独到见解，就收录。讨论时甚至谈到，一次座谈会谈不完，可以五次。我觉得，弓拉得太满，反而拉不动，不如先做一次、集一批文章再说。

以上种种，请您指教！或者您径自出题更好。

我很希望，咱们今年能出一本真正有份量的、留给历史的书。

此信同时转阎、卢、舒云三位老师，一并请教！

恭颂大安！ ■

【文衡资料】

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简况

(2003--2014)

一、简介

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是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民营企业，成立于2003年7月，注册金额1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郑仲兵。法律顾问张思之、傅可心。

二、宗旨

本中心继承和发扬中国民间编撰史志的优良传统，以现代科学观念和现代技术手段，为史学界、学术界、中国社会，构筑一个老百姓的搜集、整理文史资料的工作平台。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记录口述历史。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波澜壮阔，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很多史料、见解无法形诸笔端、录入史乘、见于报章。随着历史事件当事人的相继辞世，大量珍贵的记忆和见证不断流失，使得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越来越模糊，张冠李戴者、似是而非者、南辕北辙者比比皆是。

面对民族财富的流失，本中心希望通过记录口述历史，由拾遗补阙而去伪存真，循追思以往达探索未来。我们以至真、至诚、至善、至爱、至美、至识为目标，竭诚为老朋友、老同仁和一切有志于以自己的亲历、亲闻为历史留下见证者营造一个创作之家。

本中心虽以企业注册，实际开展的是抢救历史的公益活动，并不以盈利为目标。

三、业绩

1、采访近百位当事人、当事人亲属及有关学者

A：文革亲历者：

大学：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周泉缨、胡宗式、谢龙

中学：李冬民、刘龙江、秦喜昌、康苏君、刘进、宋彬彬

工人：刘锡昌、徐铠、安玉荣、范以本、张振元、闫德甫、赵天顺、李自卫、李阜生

中央文革、中办工作人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江青、陈伯达身边工作人员）：

戚本禹、阎长贵、杨银禄、王广宇、李传俊、矫玉山、程汝明、李子元、周淑英、赵柳恩、马晓先、李仁庆、姜宝元、缪俊胜、李景如、王保春、王文耀、邬吉成、吴连登、姚军

“九一三事件”当事人及亲属：李作鹏、胡敏、胡萍、黄春光、吴新潮、李冰天、邱路光

B、改革开放亲历者：

胡绩伟、于光远、杜润生、李锐、张思之、冯兰瑞、何方、于浩成、李洪林、马沛文、武精华、李春光、戴煌、曾彦修、吴象、朱厚泽、理夫、韦典华、朱通、郑仲兵

C、其他：

当事人及亲属：蔡省三、孙嘉瑞（梅娘）、谭天荣、康国雄、刘乃崇、谭秉文、刘备耕、王晶尧、吴持生、黄肖路、罗怀祖

学者：王年一、迟泽厚、周良宵、顾菊英、卢弘、蓝英年、郭德宏、张万舒、沈志华、韩钢、王海光、卜韦华、胡杰、梁茂春、周孝正、楚泽涵、张曼菱、刘自立、赵晓玲

2、召集十五个主题计二十五场座谈会

漫谈文革座谈会

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六周年座谈会

卞仲耘纪念会

座谈《吴法宪回忆录》

“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

十月革命座谈会

反右整风座谈会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座谈会

中年知识分子聚谈“告密”

师大女附中老校友座谈会

沈志华谈斯大林模式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研讨会

《邱会作回忆录》学术研讨会

《邱会作回忆录》与《心灵的对话》访谈

《历史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

3、积累资料

A、录像：约700余小时

B、录音：约880小时

C、文字：约560万字

4、编辑书稿

A、《工作人员谈江青》（暂定名），约60万字

B、《解放——城市记忆》（暂定名），约70万字

C、《我控诉》（暂定名）约20万字

5、《往事》

截止目前，编辑内部读物《往事》计117期，180万字。

四、中心学术顾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何 方 冯兰瑞 吴 象 于浩成 戴 煌

吴明瑜 李洪林 邵燕祥 苏双碧 蓝英年 钱理群、曹思源 刘家驹 斯树鹏
阎长贵 王广宇 徐 晓 韩 钢 何 蜀 吴 迪（启之） 王海光

附：往事目录

第一期	漫谈文革座谈会	
第二期	“陈里宁事件”始末	王广宇
第三期	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曹天予
第四期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	聂元梓
第五期	“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摘要）	王年一 何蜀
	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	王年一
	我写《大动乱的年代》	王年一
第六期	军报在文革中是怎样塑造“英雄”的？	卢弘
第七期	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	
第八期	进退皆是忧——李慎之先生片断	郭荫苟
第九期	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上）	韩钢
第十期	关于中央文革建立下属（职能）机构的回忆	王广宇
第十一期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摘录）	
第十二期	“缔造”和“指挥”的风波	阎长贵
第十三期	中国托派概述	唐宝林
第十四期	“三反”是成功的群众运动吗？	胡甫臣
第十五期	转型：穿越历史三峡	唐德刚
第十六期	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下）	韩钢
第十七期	《非常道》补遗	余世存

第十八期	我与张国焘的交往	司马璐
第十九期	二十世纪的一场民营电影梦	章立凡
第二十期	怀念一代报人王芸生	刘自立
第二十一期	一九六六年春夏的武汉	徐海亮
	故事四则	阎长贵
第二十二期	谢山诗文	
第二十三期	略论《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王芝琛
第二十四期	亲历无为大饥荒	杨金声
	爷爷之死	虞廷
第二十五期	卜占亚上下“贼船”记	迟泽厚
	故事四则	王广宇
第二十六期	倾听历史的声音——评林彪事件	千秋
第二十七期	“右派”活化石林希翎	卢弘
第二十八期	历史是个好老师	靳树鹏
	戏解西游	谢山
第二十九期	文强事件与“叛徒案”	何蜀
第三十期	断忆重庆武斗	周孜仁
第三十一期	黄吴李邱的“九月十二日”	舒云
第三十二期	我怎样成为造反派	李木森回忆
		何蜀整理
第三十三期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	唐少杰
第三十四期	基督徒的云南故事	周孜仁
第三十五期	对一份文革传单的考辨	王海光
第三十六期	内蒙古的夺权风波	吴迪

第三十七期	桥洞下的悲怆诗人	陈仁德
第三十八期	我坠入为百万人设好的陷阱	刘宾雁
第三十九期	上海“镇反”运动的历史考察	杨奎松
第四十期	灵魂哭泣的日子	陈懋智遗稿 陈仁德整理
	渴望吃肉	陈仁德
	读书梦	陈仁德
第四十一期	质疑刘伯承元帅“批林”谈话	迟泽厚
第四十二期	文革漫谈	王年一
第四十三期	《吴宓日记续编》摘录	
第四十四期	关于上书赵紫阳、邓小平反对邓力群 任总书记的经过	李锐
	李锐致赵紫阳邓小平函	
	吴江致邓力群同志的信	
	五问邓力群——据《邓力群自述》——	
	十二个春秋》	冯兰瑞
第四十五期	戴煌近作三篇	
第四十六期	北京高校竞选运动	喻希来
第四十七期	毛和文革散论	吴小龙
	“延安精神”的又一种诠释	吴小龙
第四十八期	回忆与思索：群众专政	邵燕祥
第四十九期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节选）	
第五十期	巫宁坤蒙难记	戴煌
第五十一期	广西清匪反霸见闻	莫孚

第五十二期	一个文工团员的遭遇	孙敏
第五十三期	克伦斯基谈“十月革命”	罗仁
	决战——托洛斯基笔下的“十月革命”	托洛斯基
第五十四期	关于中国近现代路径选择的思考	朱厚泽
第五十五期	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	章诒和
	《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	章诒和
第五十六期	俄国革命与民粹主义	金雁
第五十七期	一个普通大学生怎样走入文革	聂树人
第五十八期	斯大林时代的苏俄史学界	金雁
	“真空罩”下：1920—30年代的苏联	金雁
第五十九期	红色佳人泪——记李氏姐妹	卢弘
第六十期	怪诞莫名法官路	张思之
第六十一期	反右后李慎之的一封家书	
第六十二期	吴宓与家务女工	何蜀
第六十三期	王年一的一次谈话（摘录）	
第六十四期	黄万里等关于三峡工程的备忘录	
第六十五期	关于长征的对谈录	Y , C
第六十六期	《十字架的播种者》序	雅科夫列夫
	前苏联819事件回眸	思源
第六十七期	一个右派分子的逃亡记	张先痴
第六十八期	五十年后的一封信——致某反右执行者	赵文滔
第六十九期	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	冯志轩
第七十期	我与中共和衷共	周德高笔述 朱学渊撰写
第七十一期	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李洪林

第七十二期	高岗反省检查	赵家梁张晓霁
第七十三期	张思之律师谈“两案”	
第七十四期	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韩钢
第七十五期	往日军旅性见闻	刘家驹
第七十六期	“思想改造”旧文录	
第七十七期	“告密”旧文录	
第七十八期	我所经历的“党员重新登记”	邵燕祥
第七十九期	卢作孚最后的日子	赵晓铃
第八十期	改革的神话及其他——傅高义访问郑仲兵（2006年6月15日）	
第八十一期	新闻改造旧文录	
第八十二期	趋势与选择——对历史唯物论的解读与批评	张显扬
第八十三期	周良宵、顾菊英夫妇谈文革史研究	
第八十四期	广州南湖“行宫”修建记	迟泽厚
第八十五期	沈志华教授纵谈苏联斯大林道路	
第八十六期	从反左到反右——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前前后后	张显扬
第八十七期	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项建议	吴江
第八十八期	革命何以吞噬自己的儿女？——绵绵难抑的思绪	戴煌
第八十九期	毛泽东眼中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	邵燕祥
第九十期	雪泥鸿爪忆耀邦	李洪林
第九十一期	我的父亲康心如	康国雄
	1964年康心如口述（节录）	
第九十二期	朱厚泽谈“三宽”	
第九十三期	漫忆厚泽 作新斯人	余世存
	厚泽先生魂归何处？	窦海军

	想厚泽	袁正光
	厚泽同志的思想魅力将与现代文明共存	蔡德诚
	“三宽”是篇大文章——怀念朱厚泽先生	张显扬
第九十四期	朱厚泽最后的日子——郑仲兵日记摘抄 (2008年12月10日——2010年5月9日) 郑仲兵	
第九十五期	从破产法立法看“三宽政策”的硕果	曹思源
	厚泽先生的价值	梁丹
第九十六期	大跃进时期的河北副省长胡开明	老鬼
第九十七期	白色恐怖下的幸存者——台湾老兵张家林自述	
第九十八期	中共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王海光
第九十九期	“启蒙社”始末记	王永安 周修强
第一百期	朱厚泽的精神财富	李洪林
	不朽的“三宽”——悼朱厚泽	吴象
第一百零一期	历史学者座谈《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第一百零二期	1949年前民生机器厂的工潮	赵晓铃
第一百零三期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饥饿篇	刘家驹
	表演战争	刘家驹
第一百零四期	我的燕园岁月	阮铭
第一百零五期	追忆山大《沃野》	贺立华
第一百零六期	亲历改革初期理论风云	阮铭
第一百零七期	邱会作纵观九大	
第一百零八期	《李作鹏回忆录》(节选)	
第一百零九期	《邱会作回忆录》座谈会发言摘录	
第一百十期	《记忆的漩涡》(节选)	雅科夫列夫著 蓝英年译

- 第一百一十一期 辛亥先贤论革命
- 第一百一十二期 嫣变：从批江青到批邓（上） 郑仲兵
- 第一百一十三期 嫣变：从批江青到批邓（下） 郑仲兵
- 第一百一十四期 胡耀邦在陕西省委的一次讲话（1965.1.22）
- 第一百一十五期 我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李传俊
- 第一百一十六期 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评《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 韩钢
- 第一百一十七期 我曾陪伴过肖力 宋玉芬■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本期校对：续霜红

本期版式：宁人